DOI: 10.6243/BHR.2013.050.097

藏人論藏:民國時期藏人的西藏觀*

簡金生**

摘要

相對於西方之西藏觀的豐富研究,中國之西藏觀研究則略顯不足。民國時期,知識分子及各種報刊與論出版了大量包括西藏在內的邊疆及非漢族群問題的著作。這些討論西藏議題的作者,除了漢人之外,當時旅居中國內地的藏人亦參與其間。本文藉由分析由九世班禪所辦的刊物以及藏人的著作裡,為漢人提供了何種關於西藏的觀念。

由於反對達賴喇嘛及拉薩政府,在康藏糾紛中,班禪與康區藏人主張西康在政治上並不屬於西藏。但是也唯有此點是旅居中國內地的藏人同意於漢人的一點。另方面,為了對抗西康統治者劉文輝,康人援引漢人的政治術語,打出「康人治康」口號。針對漢人所訴求的「中華民族」與擁有西藏主權的主張,藏人則以「五族共和」及「檀越關係」來回應。儘管接受三民主義的現代化意識型態,但是藏人非常難以同意漢人對西藏文化不文明的攻擊,並對漢人在種族與宗教上的偏見予以回應。雖然當時旅居中國內地的藏人提供過不同於漢人所認知的西藏觀,然而藏人自己的聲音是微弱的。另方面,藏人以英文、中文的自我表述,又在跨語言的翻譯中被稀釋、轉化,從而附屬於中國人與西方人對於西藏的想像。

關鍵詞:西藏、西藏觀、漢藏關係、九世班禪、康人自治

^{*} 感謝三位匿名評審極為有益的批判性意見和架構調整,與指導教授張瑞德先生的指導,以及政治大學台史所助理教授林果顯先生對初稿提出的諸多建議。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過去在民族主義史學典範下,位處邊疆的滿、蒙、回、藏、苗、瑤等非漢族群被自然地視為中華民族的部分組成,邊疆地區也無可置疑地成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都認為繼承自清朝統治下多元民族的疆域是無可置疑的。然而一九九〇年代以來,美國新清史學界對何謂中國的問題提出挑戰。其最核心的觀點乃是在清朝與中國之間劃下界線:對滿清統治者而言,大清帝國的疆域,除了中國本部(China proper)的十八省外,還包括蒙古、西藏和新疆等亞洲內陸地區。大清帝國的成功,在於將中國本部的農業地帶和內陸亞洲的游牧地帶整合起來。誠如 Pamela Kyle Crossley、James A. Millward、Mark C. Elliott 等人都注意到,帝國內滿、漢、蒙、藏、回五個族群,並非以等級且同質性地存在於帝國之內,而是以平行關係同時地向滿清統治者、愛新覺羅氏效忠;也就是說,對於位處亞洲內陸邊陲地帶的非漢民族採取多元而靈活的政策,乃是清帝國成功統治的關鍵。1

就漢藏之間而論,西藏做為帝國版圖的一部分,是因為滿清皇帝身為西藏佛教的施主與保護者。清帝不僅利用對西藏佛教的支持來鞏固對西藏、蒙古的控制,清帝本身就是文殊菩薩的化身,以及一位支持佛法的轉輪王,從而統合蒙藏兩族。²不過,當清帝國在1911年覆亡後,漢藏之間宗教上的中介消失,成為西藏脫離中國的理據。

I 關於新清史研究的綜合評論,見: Joanna Waley-Cohen, "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Issue 88 (winter, 2004), pp. 193-206。針對新清史的觀點,趙剛認為,帝制時代的「中國」觀,本來就不以種族核心,而是以儒家禮儀秩序及制度為基礎的文化主義。滿清入關後,將「中國」的觀念擴展到其治下的所有區域,這為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概念奠定基礎。見: Gang Zhao, "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odern China, Vol. 32: 1 (January, 2006), pp. 3-30.

² 關於清帝與西藏佛教含混而複雜關係的討論,見:石濱裕美子,《清朝とチベット 仏教:菩薩王となった乾隆帝》(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2011年)。

漢藏之間雖自 1911 年後即無實質上的隸屬關係,然而對西藏現代史來說,藏中關係卻是除了藏英關係之外最重要的外在因素,並影響 1951 年之後中共對西藏的政策與態度,以及形塑了當代流行於國際間所指稱的西藏問題之根源。由此,導致兩種對立的西藏史與西藏觀的出現。在中共的版本裡,舊西藏社會顯然是封建主義籠罩之地,並與西方帝國主義相勾結,根據官方發表的白皮書:

十四世達賴及其政治集團是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和極少數農奴主階級的總代表,是舊西藏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的壟斷者和既得利益者。他們與占西藏人口絕大多數的廣大勞動人民存在著根本的利害衝突,與西藏社會發展進步的要求和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存在著不可調和的深刻矛盾……所謂「西藏問題」從一開始就是帝國主義妄圖瓜分中國的產物,是近代帝國主義列強妄圖變中國為其殖民地、半殖民地圖謀的一部分……3

與此相對,過去的西藏在藏人筆下則是:

多數藏人並不羨慕統治階層……因為它帶來煩惱、痛苦和極少的報酬……我們不是生活在貧困中,我們的家很舒適。我們不需要多餘奢侈品亦可生活得很好。了解到我們並不羨慕貴族生活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有人宣稱貴族制度使我們墮落,但唯一墮落的是貴族自己。我們願意將政治、經濟問題讓負責的人去解決,感謝上天這些公事不是我們的。4

顯然的,如此完全對立的西藏圖像乃是來自不同的政治經驗與意

3 《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書(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9.3), 頁14-15。

Thubten Jigme Norbu and Colin M. Turnbull, *Tibe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8), p. 50. 按, 土登晉美諾布 (Thubten Jigme Norbu) 為十四世達賴喇嘛長兄。

圖,不同的學術研究目的或多或少亦捲入其中。⁵更直接地說,兩個對立的西藏都是來自同一個根源,即民族主義的衝突。一方是多民族國家為維護其主權與領土的不可分割,一方則是民族自決與獨立的權利。而其背後總是連帶著對歷史解釋的競爭。從現實政治而至歷史詮釋,對立的主張有各自的支持者,即使是專業學者亦難完全避免於這兩種對立的主張之外。對西藏史與西藏文明的研究,從一開始就得面對其研究成果是否會引伸出何種歷史解釋與隨之而來的政治標籤,更遑論研究者以及挪用與西藏相關符號的論述者,是否於自覺或不自覺地打造出某種西藏形象。

就此而言,國際藏學界自 1980 年代末期起已有不少專著在探討西方人所建構出的特定西藏觀。藉助薩依德 (Edward W. Said)東方主義的概念,大體而言,這些專著批判性地指出西方世界裡其西藏熱潮所隱含的東方主義傾向。數世紀以來,西方人的西藏觀,經過傳教士、探險家、啟蒙思想家、神智論者(theosophist)、小說家、嬉皮、藏學家和海外流亡藏人們聯手,創造出一個神話的西藏、精神上虛擬的西藏。西藏被想像成西方文明的拯救者、人性的綠洲、未受過現代文明污染的人間淨土與天堂,是西方人尋求心靈寄託與精神慰藉的神聖烏托邦。香格里拉的西藏,掩蓋了一個現實的、物質的西藏,並把這個烏托邦化的西藏作為解決「西藏問題」的前提。6

John Powers 在比對親中與親藏的兩方著作後指出,雙方其實完全同意西藏歷史上所發生的主要事件,從唐代直至1959年拉薩事件,但雙方的詮釋差異卻天差地遠,詳見: John Powers, *History as Propaganda: Tibetan Exiles versu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相關著作可見: Peter Bishop, The Myth of Shangri-la: Tibet, Travel Writing and the Western Creation of Sacred Landscap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eter Bishop, Dreams of Power: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London: Athlone Press; Rutherford, N.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Donald S. Lopez,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Orville Schell, Virtual Tibet, Searching for Shangri-La from the Himalayas to Hollywood (New York: Henry Holt& Company, Inc, 2000); Thierry Dodin, Heinz Raether, (eds.), Imagining Tibet: Perceptions, Projections, and Fantasies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1); Dibyesh Anand, Geopolitical Exotica: Tibet in Western Imagin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然而,與此相對的是,在漢人如何塑造西藏形象這一問題上,卻只有極少的討論。目前學界對於漢人的西藏觀研究,不僅數量少,且未著重於現代。在西方學界方面,Martin Slobodnik 的論文指出,自唐代起,由於軍事上的威脅,吐蕃即被形容為一野蠻殘暴的民族。儘管在元、明、清三代,西藏因其作為西藏佛教的起源地,皇室與上層貴族對西藏的宗教領袖禮遇有加;然而,史料中的西藏人,其形象仍是無禮、呆笨、服從權威與接近獸性。⁷沈衛榮則針對元、明兩代中國文人眼中的西藏佛教形象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從元代文人起,所刻畫出的三種西藏僧人形象——神僧、妖僧及惡僧——不僅遠播海外,流風更餘傳至今。由於番僧的得志與所傳秘法在朝廷內的流行,士人們對番僧的行為與傳教給予負面評價,視為禍國殃民的妖術。經由將西藏佛教加以情色化、政治化與巫術化,西番固定於化外遠夷的位置上。「喇嘛教」一詞也正是在萬曆年間開始被使用,以此削弱、否定其宗教意義。8

如此一來,在傳統漢人的西藏觀之外,缺少對於從清末起漢人眼中的西藏形象的研究。然而,正是從清末起,在西力的衝擊下,漢藏關係完全不同於以往模糊而特殊的天朝藩屬體系,被迫改以所謂的「宗主權」架構來解釋。更重要的轉變則是,自1911年起,西藏在實際上其內政與外交就不再接受中華民國的指揮,從北京政府而至國民政府的歷屆中央政權,也未曾有效管轄西藏。對藏人來說,直至1950年以前,西藏作為獨立國家的事實,

2007); Tom Neuhaus, Tibet in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 \circ

Martin Slobodnik, "The Perception of Tibet in China: Between Disdain and Fascination," 《輔仁歷史學報》,17(臺北,2006.11),頁71-109。

^{*} 沈衛榮,〈神通、妖術和賊髡:論元代文人筆下的番僧形象〉,《漢學研究》,21:2 (臺北,2003.12),頁219-247;沈衛榮,〈"懷柔遠夷"話語中的明代漢、藏政治與文化關係〉,《國際漢學》,第13輯(鄭州,2005.9),頁213-240; Shen Weirong & Wang Liping, "Background Books and a Book's Background: Images of Tibet and Tibetan Buddhism in Chinese Literature," Monica Esposito ed., *Images of Tibe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V. I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ème-Orient, 2008), pp. 267-300.

所缺乏的是國際現實的承認。⁹但是,在當時的漢人政治與知識菁英看來,西藏仍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除了在外交上繼續堅持此點外,漢人菁英也將其主張與想像 投射於過往的歷史。西藏的地位從前清時代的封建藩屬,藉由現 代主權國家的知識架構,被轉換為宗主國乃至主權隸屬的現代政 治關係。因此,在現代中國之民族國家建構的過程裡,西藏並未 因其政治上脫離中國的掌控而空缺。西藏不斷地出現在各式各樣 的官方檔案、撰著、考察調查報告、旅行日記等文本裡,形成時 人建構與認識西藏的知識來源。即使是中小學的歷史、地理教科 書裡,學生也會學習到包括西藏在內的「邊疆民族」之史地常 識。這些文本的作者、編輯者,以漢人佔絕大多數。可以說,對 於中國邊疆地區以及居住其間的非漢族群的敘述,都由漢人所主 導。事實上,中共官方與流亡藏人所描繪的兩種對立的西藏形象 都存在於1949年以前。毫無意外,絕大多數漢人所構築的西藏形 象多半是落後的封建主義籠罩之地,並與西方帝國主義相勾結。

不過,在如此龐大的資料文本中,亦有少數是由非漢族群出身的作者以中文寫作。這也意味著,在描寫異族這件事上,漢人的作品不再是唯一的來源,他者對自身的表述也參與著漢人對非漢族群的表述。由於民國時期起漢藏之間的交流規模更甚往昔,除了古典藏文佛教典籍之外,當時因各種因素而旅居中國內地的藏人,也以中文撰述西藏史事,擴大了漢人關於西藏知識的來源。因此,本文所欲探討的藏人論藏,乃是限定在整個民國時期裡以中文為載體的文本,分析藏人在此時期的論述,是如何表現西藏。是故,此處所要追問的問題是,在漢人建構西藏知識的同時,藏人的著作扮演了何種角色?漢人是如何看待、參考與挪用藏人的著作?由於旅居中國內地這一角色的特殊性,這些藏人是否傳達出不同於來自西藏與他處的藏人的意見?以及,藏人的著

茨仁夏加著,謝惟敏譯,《龍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後的西藏》(新北市:左岸文化,2011),頁41。[英文本: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作是否能抗衡於中華民族的主要敘事之外,而表達出藏人自己的 聲音?

就整個西藏而言,在政治與宗教上最有發言權威者,當屬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然而,民國時期,向中國內地論述何謂西藏這件事,並不被當時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Thub bstan rgya mtsho, 1876-1933)及拉薩當局所重視;或者說,在當時漢藏關係不同於往昔的情況下,西藏政府有意地避免與中國進行過多的互動。就目前所見,還未發現西藏當局以中文來宣傳、介紹關於西藏的任何文本。

同一時期,西藏佛教的另一位活佛——九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尼瑪(Thub bstan chos kyi nyi ma, 1883-1937),在1923年12月22日離開札什倫布寺後,經青海、內蒙前往中國內地,自此與達賴喇嘛決裂。¹⁰為表現對九世班禪的尊榮與禮遇,國民政府委任他為國民政府委員,頒授「護國宣化廣慧大師」的頭銜,之後又加封為「西陲宣化使」。¹¹在政治上獲得國民政府如此擁護,九世班禪除了為國民政府進行邊疆地區的宣慰政治外,代表班禪官方機構身分的班禪駐京辦公處及西陲宣化使公署,先後創辦《西藏班禪駐京辦公處月刊》、《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作為在文字上致力於「五族共和」及「擁護民國」的宣傳刊物。除九世班禪之外,

有關十三世達賴與九世班禪間的衝突,見: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62-63, 110-120; Fabienne Jagou, translated by Rebecca Bissett Buechel, The Ninth Panchen Lama (1883-1937): A Life at the Crossroads of Sino-Tibetan Relations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Chiang Mai, Thailand: Silkworm Books, 2011), pp. 23-57。不過Melvyn C. Goldstein將班禪出走的日期定為 12月26日;而Fabienne Jagou則定為12月22日,見pp. 23, 206。中文資料多將班禪出走時間記為民國12年(癸亥)11月15日,如:劉家駒編譯,《班禪大師全集》(重慶:班禪堪布會議廳,1943),頁36;丹珠昂奔主編,《歷董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年譜》(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635;牙含章,《班禪額爾德尼傳》(北京:華文出版社,2000),頁246;蘇發祥主編,《歷董班禪額爾德尼》(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158等。若以中曆換算成西曆,則為1923年12月22日。

¹¹ 丹珠昂奔主編,《歷輩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年譜》(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1998),頁639-650;喜饒尼瑪,〈九世班禪出走內地述略〉,《近代藏事研究》(拉 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頁163-179。

章嘉呼圖克圖(1890-1957)、諾那呼圖克圖¹²也在國民政府的支持下,分別宣慰於西北蒙旗與川康。諾那呼圖克圖並以西康諾那呼圖克圖駐京辦事處宣傳科的名義,編印一份《新西康》期刊,同樣以致力於「漢滿蒙回藏五族大聯合」為宗旨。

除了這幾位大喇嘛之外,尚有其他康藏籍藏人旅居中國內地,其中包括因捲入藏川康青之間戰爭而著名的格桑澤仁¹³、劉家

¹² 諾那呼圖克圖 (1865-1936), 出生於西藏昌都類伍齊寺 (又名諾那寺)。1910年趙 爾豐在川邊推行改土歸流,諾那率康區民兵助趙爾豐平定39族及25部,是故受清 冊封為「西康佛教大總管」。1913年川藏戰後被藏軍質押,後逃出。1917年川藏第 二次戰起,諾那助漢軍,邊軍統領彭日昇敗降,諾那則於1918年被解至拉薩。 1924年逃困,潛赴尼泊爾、印度,經海路至上海。1925年至北京,1926年冬經人 介紹至四川重慶,得劉湘及所部皈依,並在北培成立諾那精舍。1927年,由四川督 辦公署李公度派其兄李公烈護送至南京,又兼其秘書,為諾那謀劃。1929年1月,在 戴季陶的推薦下,任蒙藏委員會委員,並准他援照九世班禪喇嘛例成立西康諾那 呼圖克圖駐京辦事處,1929年在南京、重慶、成都、康定設立辦事處。1935年蔣 介石委派諾那擔任「西康宣慰使」,8月抵康定,不久與24軍發生衝突,在康北各 縣驅逐劉文輝勢力。1936年2月紅軍經過康北,諾那堵擊失敗,離甘孜經下瞻對 時,被下瞻對土司拘捕,送交紅軍。1936年5月,重病圓寂,享年73歲。參見:唾 葊羅傑,⟨諾那呼圖克圖應化並⟩,《新亞細亞》,3:3(南京,1931.12),收入: 徐麗華、李德龍主編,《中國少數民族舊期刊集成》,第60冊(北京:中華書局, 2006), 頁138-140; 韓大載, 〈諾那呼圖克圖行狀〉, 《康藏前鋒》, 4:1-2(南京, 1936.10),收入:徐麗華、李德龍主編,《中國少數民族舊期刊集成》,第35冊, 頁 189-199;圓覺宗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教育基金會編輯組整理,〈西康諾那呼圖克 圖年譜〉,《諾那呼圖克圖法語開示錄》(臺北:圓覺宗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教育基金 會,2002),頁81-102;江安西、來作中、鄧俊康,〈諾那事變記略〉,中國人民政 協會議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四川省省志編輯委員會編,《四川文史 資料選輯》,第29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頁64-77;陳濟博,〈我所 知道的諾那〉、《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29輯,頁77-87;周錫銀、〈諾那的部分重 要史料輯錄〉、《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29輯、頁88-94;馮有志、《西康史拾遺》 (康定:中國人民政協會議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94),頁 140-160;關於諾那的活佛身分與生平的進一步考證,見:黃英傑,〈上師生命的 聖與俗 —— 諾那活佛轉世身份初探〉,《輔仁宗教研究》, 19 (臺北縣, 2009.9), 頁 167-200; 黃英傑,〈民國佛教懸案——諾那活佛死亡之謎初探〉,《輔仁宗教研 究》,第21期(臺北縣,2010.9),頁181-203。

¹³ 格桑澤仁(1905-1946),漢名王天化,四川巴塘人,「巴安三傑」之一,就讀巴安縣立小學、華西教會學校。1926年入四川雅安陸軍軍官學校步兵科,畢業後,任西康屯墾使署康區宣慰員,二十四軍邊務處參事。之後,隨九世班禪代表宮敦札西(貢登扎西)赴南京,任蒙藏委員會翻譯,又經戴季陶的推薦,1928年夏任蒙藏委員會委員兼藏事處處長及《蒙藏週報》社副社長。其間格桑澤仁在南京組織「西康青年勵志社」,引同鄉青年劉家駒等至南京;此外,在戴季陶的支持下,又通過蒙藏委員會在中央政治學校內附設一個西康班,由格桑澤仁任副主任。1931

駒¹⁴等人。面對完全不同於昔日王朝國家體系下的漢藏關係,除了

年4月底,國民黨中央委派格桑澤仁為西康省黨務特派員,赴巴安籌組地方黨部; 但格桑澤仁是先至雲南中甸,由龍雲委任為滇康邊區宣慰使,召集土司頭人喇嘛 居間調停紛爭。1932年1月初,格桑澤仁抵巴塘,開展黨務工作,號召「康人治 康」。另方面,劉文輝亦在康定組織「反格大同盟」,並向南京國民政府告狀。2月 26日,因黨員遭劉文輝24軍42團戕殺,格桑澤仁遂將該團繳械,成立「西康邊防 軍司令部」(西康民族自衛軍),自任司令,並任命巴安等縣縣長,史稱格桑澤仁 事件(又稱巴安事變)。3月底,劉文輝與藏軍再度開戰,藏軍同時攻擊在巴安的格 桑澤仁。10月,戰事結束,回南京,委為參謀本部邊務組專門委員。1934年夏, 奉蒙藏委員會及參謀本部會派,到甘肅、寧夏、青海視察蒙藏區域。1935年,任 四川行營邊政委員會委員。1937年抗戰起,組織康藏宣傳團,由劉曼卿任團長, 又組西康僧俗民眾慰勞代表團,從事宣傳慰勞工作。1941年,與劉文輝達成和 解,自重慶返巴安。1942年,成立康藏貿易公司,自任董事長,加強中印間的運 輸。1945年,獲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6年,被選為國民大會代表。同年6月5 日,因病去世,終年42歲。參見:格桑澤仁,〈自我介紹(代序)〉,《邊人芻言》(重 慶:西藏文化促進會,1946.11),收入:張羽新、張雙志編纂,《民國藏事史料彙 編》,第19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頁170-174;馮有志,《西康史拾遺》, 頁114-120;丹珠昂奔主編,《藏族大辭典》(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頁 260,「格桑澤仁」;協饒益西,〈近代康區著名政治活動家——格桑澤仁〉,《康定 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4:6 (康定,2005.12),頁8-11;王川, 〈格桑澤 仁傳略〉,《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11(成都,2009.3),頁28-32。 劉家駒(1900-1977),藏名格桑群覺,四川巴塘縣人,「巴安三傑」之一。先後就 讀巴安官話學堂、巴安縣立高等小學、巴安華西教會小學。1926年起,任巴安縣 立小學校長,並曾代理巴安縣教育科長;1927年2月在巴安組織西康國民協進會, 任副會長,抵抗藏軍,後加入劉文輝24軍。一般傳記資料指出,劉家駒是1929年 應同鄉格桑澤仁之邀赴南京。(不過,據劉家駒的自述,是1928年由鄉眾公推入 京,見劉家駒,〈康藏之過去與今後建設〉,《新亞細亞》,3:5(南京,1932.2), 頁 567。) 1930 年起任蒙藏委員會藏事處科員、《蒙藏週報》社藏文股主任,1931 年加入國民黨,任蒙藏委員會藏事處第三科科長、蒙藏委員會委員。1932年,受 九世班禪駐京代表羅桑堅贊賞識,任班禪參議及中文秘書,同年七月轉任班禪行 轅秘書長,年底獲任為西陲宣化使公署秘書,又被任為西康建省委員會委員。 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禪在玉樹圓寂後,國民政府同意將其遺體移送西康甘孜。 停留期間,班禪行轅衛隊長孔薩益西(益西多青)欲入贅女土司德欽旺姆,遭致 劉文輝反對,班禪行轅衛隊遂於1939年12月於甘孜與劉文輝駐軍發生衝突。在此 「甘孜事變」中,劉家駒以「康人治康」號召地方土司反對劉文輝的統治。事變 失敗後,接行政院電令,繞道至重慶擔任班禪駐渝辦事處處長,又任為國民政府 軍事委員會參議。1946年至南京,任中央大學邊政系藏文講師,受教育部蒙藏司 委託,負責翻譯高小語文教科書。1947年,選為立法院立法委員。1950年初,劉 家駒參與組織「巴安軍政僧俗各界聯合警衛辦公處」,迎接解放軍入康。1956年, 西康、四川合省後,調赴四川省教育廳、省民族出版社工作。相繼當選為四川省 政協第二、第三屆委員、四川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參事室參事。1977年病故於巴 塘,享年77歲。其著作有《康藏》、《西藏政教史略》、《班禪大師全集》、《藏漢合 壁實用會話》,譯著《六世達賴情歌》,及收集整理之《西藏情歌》、《康藏滇邊歌 謠集》等。參見:陳強立,〈格桑澤仁、諾那、劉家駒〉,中國人民政協會議四川 部分藏人高僧就西藏佛教的傳教事業進行論述外,這些旅居中國 內地的藏人們,針對漢人蓍英所關心的西藏問顯提出代表藏人立 場的看法。此外,尚有極少數的藏人,由於特殊緣故,經英人的 協助,以英語向世界表述出藏人自己的觀點;而這些著作,又被 轉譯成中文而為中國人所閱讀。為了說明這些藏人自我的西藏 觀,將以三個面向切入。首先是漢藏之間的歷史關係,以及當時 因衝突而引發的西康歸屬及康藏一體的討論。這一點將可檢驗, 藏人如何回應漢人所認知的漢藏一體。而處在西藏政府與國民政 府之間,旅居中國內地的藏人又如何凸顯其特殊位置。其次,以 西藏佛教及藏人女性為例,討論藏人如何看待自我獨特的文化表 現,而這兩點正是漢人對西藏這個異文化最為在意的部分。第 三,則是藏人著作在轉譯過程中的問題,包括藏人的中文與英文 著述在內。通過這三個面向分析,來解釋在面對漢人的文化優勢 下,藏人是否不可免地完全認同於漢人,抑或在其中表現出不同 於漢人所表述的西藏之另一面。這些問題的釐清,將有助於進一 步理解漢人西藏觀的研究。

二、漢藏歷史與康藏衝突的表述

(一)漢藏歷史關係的性質

對漢藏歷史關係的闡述,首先遭遇的困擾即是何謂「西藏」。 在藏人來說,藏人稱自己的國家為「Bod」(即吐蕃/圖伯特),藏人自稱為「Bod Pa」(博巴),稱藏地為「Bod yul」。所謂的「Bod」的地理範疇就是指藏人分布的地區,涵蓋了整個青藏高原。自五世達賴喇嘛起,傳統上藏人自己的劃分是上部阿里三圍、中部衛藏四茹、下部朵甘思六崗。其中,衛(dbus)、藏

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四川省省志編輯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27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頁117-129;李明忠,〈劉家駒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員會編,《甘孜州文史資料》,第11輯(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90),頁73-79;馮有志,《西康史拾遺》,頁 336-351;丹珠昂奔主編,《藏族大辭典》(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頁465,「劉家駒」等。

(gTsang)、安多(Amdo)、康(Khams)並稱為「卻喀松」(Bod chol kha gsum)三區¹⁵。如以民國時期中國人概念中的地理稱呼來對應,大致上分別指西藏、青海與甘肅一部、西康及雲南西北部。以現今的行政區劃來說,包括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的「西藏自治區」(TRA);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青海省海北、黃南、海南、果洛、玉樹等藏族自治州,轄於青海省的海西藏族蒙古族自治州;四川甘孜、阿壩等藏族自治州,以及隸屬於雲南省的廸慶藏族自治州等¹⁶。時至今日,這也是西藏海外流亡組織對於西藏地理與政治範圍的主張¹⁷。

至於「Tibet」一詞,乃是一個來自歐洲的名稱。依石泰安(Rolf A. Stein)的看法,九世紀起,伊斯蘭文獻使用「Tübbet」、「Tibbat」來稱呼「Bod」,此種寫法再由歐洲的旅行家引入歐洲,於19世紀形成「Tibet」一詞。¹⁸因此西方人是以「Tibet」一詞來泛指包括衛藏、安多、康等藏人居住區。清末民初以後,西方、特別是英印的駐藏官員,均認為「Tibet」一詞具有政治與族群上的意義。曾任英印政府駐亞東商務專員Sir Charles A. Bell(1870-1945)認為,「Tibet 一詞應該區別為「Political

15 參見19與20世紀的藏人史學著作:智觀巴·貢卻乎丹巴繞吉(1801-?)著,吳均、毛繼祖、馬世林譯,《安多政教史》(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89),頁3-4;根敦瓊培(Dgevdunchosvphel, 1903-1951)著,法尊譯,王沂暖校訂,《白史》(蘭州:西北民族學院,1981),頁5-8(按:根敦瓊培亦有作更敦群培)。更進一步的藏文文獻探討,見:格勒,《論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與周圍民族的關係》(廣州:中山大學,1988),頁26-32。

¹⁶ 有關藏人居住區域的行政區劃演變,參見:陳慶英、馮智,《藏族地區行政區劃簡說》(北京:五洲出版社,1995)。

^{17 &}quot;Memorandum on Geniune Autonomy for the Tibetan people",「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網」,網址: http://tibet.net/important-issues/sino-tibetan-dialogue/memorandum-ongeniune-autonomy-for-the-tibetan-people/(中文版則為〈有關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符其實自治的建議〉)

Rolf A. Stein, trans. by J. E. Stapleton Driver, *The Tibetan Civilization* (London: Faber, 1972), pp. 30-31.(Originally published as *La civilisation tibétaine*, Paris: Dunod Éditeur, 1962)。有關藏、中、外學界對「Tibet」一詞來源的各種研究,參見:林冠群,《唐代吐蕃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頁 19-31。至於「吐蕃」與「禿髮」兩詞之間的論辯,見:卓鴻澤,〈"吐蕃"源出"禿(偷)髮"問題析要〉,《歷史語文學論叢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70-97。

Tibet 」(「政治的西藏」)與「Ethnographic Tibet」(「民族的西藏」)¹⁹;而這種看法為 H. E. Richardson(1905-2000)所承繼²⁰,從而成為西方人對於「Tibet 一詞的普遍認知。在當代,由此而來的政治問題,即是相對於中共現行行政區劃下,西藏海外流亡組織主張建立「大西藏」(Greater Tibet)的爭議²¹。

而中文裡「西藏」一詞的說法,最早出現於《清實錄》康熙二年(1663)。在此之前,清人先後用「土伯特」、「烏斯(思)藏」、「圖白忒」或「唐古特」來稱呼西藏,特別是指衛、藏地區。此後或許是藏文「衛藏」中的「衛」字與滿文中的「西方」(wargi)一詞讀音相近,且衛藏又處在中國的西南方向,因此「衛藏」一詞先在滿文中譯為「wargi Dzang」,即「西方的藏」,再從滿文譯成漢文的「西藏」一詞。²²

對歷朝中國政府而言,藏人所使用之「大西藏」一詞的族群 與地理概念,並不等於拉薩政治勢力所能完全企及之地。簡單地 說,1723年(雍正元年),因青海和碩特蒙古的叛亂,雍正於平亂 後在西寧設青海辦事大臣,將青海北部納入清政府的直接統治。 1727年,因西藏的內部紛爭再度派兵進藏後,一方面重新在拉薩 駐軍,確立駐藏大臣的定制;同時進一步對康區進行分割,將理 塘、巴塘、德格三大土司劃歸四川省管轄,中甸、阿墩子、劃歸 雲南省,四川、雲南、西藏三方會勘地界,以金沙江以西之寧靜

Sir Charles 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8), p. 5.

Huge E.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Boston: Shambhala, 1984, 2nd), pp. 1-2.

²¹ 有關「大西藏」的相關評述,見:張雲,〈"大西藏"與"西藏獨立"的夢想〉、〈再論西藏行政區劃與"大西藏"問題〉,張雲,《西藏歷史問題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頁167-169、180-191;林冠群,〈「大西藏」(Greater Tibet)之商権——西藏境域變遷的探討〉,《蒙藏季刊》,20:3 (臺北,2011.9),頁30-47;Melvyn C.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 124-131等。

²² 陳慶英,〈漢文「西藏」一詞的來歷簡說〉,《燕京學報》,6(北京,1999.5),頁 129-140。在此順便說明,基於尊重族群自稱的原則,本該以「圖博特」與「博 巴」來取代「西藏」與「藏人」的稱呼。然而,就本文所處理的文本及時間來 說,如此替換,將會增加行文上的困擾及閱讀上的困難。因此,除非有必要,否 則一律使用「西藏」、「藏人」等詞彙。

山為川藏、滇藏界線。²³儘管從清末起這個界線會因漢藏雙方實力的對比而變動,不過在 1932 年的康藏戰爭結束後,漢藏雙方的勢力分佈大致依此為界。²⁴

從「Bod」、圖伯、「Tibet」到「西藏」,對此詞不同認知的困擾只是起點。由此展開,漢藏彼此對西藏史的敘述,其差異之巨大可想而知。就藏人來說,過去的西藏政治史,就是純粹宗教上「檀越關係」(mchöd yön, priest and patron, or patron-lama)之表現²⁵。以「檀越關係」作為解釋藏中關係基礎的著作,當推前西藏政府官員夏格巴(Tsepon W. D. Shakabpa,1907-1989)的《西藏政治史》一書。蒙古人與西藏人之間,是在忽必烈與八思巴時首度締結此一「檀越關係」。這意味著宗教對世俗權力的支持,換來了世俗對宗教在精神上的支持。世俗為宗教提供協助,宗教為世俗提供指導。其中並不存在臣服的一面。同樣的,滿洲皇帝與達賴喇嘛的關係也是如此。而當1912 年滿洲皇帝退位後,藏中之間此一「檀越關係」即宣告結束。²⁶

然而,對漢人知識分子而言,漢藏一體有歷史上淵源流長的 證據,漢藏往來於史不絕。由於文本眾多,此處不妨縮小範圍,

li M於清代前期與西藏的互動,以及康雍乾三代在青海(安多)、康區的措施,見: Luciano Petch,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Tibet (Leiden: E. J. Brill, 1950), Ch 7, pp. 10-12;陳慶英、 高淑芬主編,《西藏通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頁327-394。劃界一 事,從雍正三年至雍正十年,見:柳陞祺、常鳳玄、〈西藏名義辨析〉,《中國藏 學》,1988:2(北京,1988),頁24-26。

²⁴ 關於 1930年代青、康、藏戰事的說明與研究,見:林孝庭,〈戰爭、權力與邊疆政治:對1930年代青、康、藏戰事之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5(臺北:2004.9),頁105-141; Lin, Hsiao-Ting,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 (Vancouver: UBC Press, 2006), pp. 51-70.

²⁵ 這個名詞依字面的意譯為「喇嘛與施主關係」,另有多種譯法,如「供施關係」、「施主與福田」、「権雍關係」等。進一步的說明,見:D. Seyfort Ruegg, "MCHOD YON, YON MCHOD AND MCHOD GNAS / YON GNAS: On the Historiography and Semantics of a Tibetan Religio-Social and Religio-Political Concept," in Alex McKay ed., *The history of Tibet*, Vol. 2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362-372.

Tsepon W. D. Shakab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ch4, ch10, pp. 70-71, 169-170 °

以班禪名下所主持的刊物——《西藏班禪駐京辦公處月刊》²⁷及《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²⁸——作為取樣對象。一方面,在班禪而言,刊物的發行既可向國民政府宣示他的存在;另方面來說,在藏人主辦刊物的名義下,更容易比較出漢藏作者之間的距離。時任班禪返藏護送專使行署參贊的馬鶴天(1887-?),在一篇發表於《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的文章裡指出,西藏自從中國輸入佛教起,乃至曆數、法政、農工、衣食住、藝術、醫藥、文學等各方面,皆深受中國唐代文成、金城兩公主所帶去的影響,且形塑至今。²⁹對漢人來說,過去的漢藏關係史即意味著現代民族國家架構下的主權關係。

然而仔細考察,藏人對於藏中關係,則有自己的看法,在文字表述上透露出細微的觀點差異。毋寧說這種表述代表的,正是

²⁷ 《西藏班禪駐京辦公處月刊》自1929年6月創刊號始,至1931年止,其間不定時分別發行了第一、二期合刊本(1928.7-8),第三、四期合刊本(1929.10),第五、六期合刊本(1930.7),第七、八期合刊本(1930.10),第九、十期合刊本(1931.3)。

[《]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自1935年5月發行第一期始,其後不定期發行了第二期 (1935.6),第三期(1936.1),第四、五期合刊本(1936.3),第六期 (1936.4),第七、八期合刊本(1936.10),第九期(1937.5)。恰好這份刊物有 印數發行報告,可以推測其主要讀者應不會是藏人。在第一期第128頁的「署務報 告」欄目中,該刊宣示「本公署宣化之對象為蒙藏兩大民族」;不過根據第六期插 圖頁後所附之「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發行統計表」與第七、八期合刊本所刊載之 「西陲宣化使公署駐京辦事處公函(宣字第二三號)」所提供的數字資料,其可能 的讀者更應該是具有官方身分的中國人為主及知識分子。除創刊號發行 2,000 冊 外,其餘各期皆發行1,500冊,其中1,470冊作為贈閱及交換之用。其最主要的可能 讀者分別是各省市政治機關(530冊)、各喇嘛寺及佛教團體(188冊)、西藏及蒙 古各盟旗(179冊)、中央各政治機關(155冊)、全國各大學及本京各中學(98冊)、 各軍事機關(87冊)、中央及各省市黨部(53冊)、各大雜誌社及報社(48冊)、各 省市圖書館及民教館(41冊)、各政治及學術團體(14冊)、其他(77冊)。見:《西 陲宣化使公署月刊》,1:6(南京,1936.4)、1:7-8(南京,1936.10),收入: 馬大正主編,《民國文獻資料叢編·民國邊政史料匯編》,第7冊(北京:國家圖書 館出版社,2009),頁4、420。

²⁹ 馬鶴天,〈唐代對於西藏文化之影響〉,《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1:7-8(南京,1936.10),《民國文獻資料叢編·民國邊政史料匯編》,第7冊,頁237-244。此類文本過多不多舉,僅再以《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為例,如李東佛之〈西藏之過去與現在〉一文,即就五族共和觀點將唐、元、明、清以降各時代之漢藏關係簡短勾勒,見《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1:6(南京,1936.4),《民國文獻資料叢編·民國邊政史料匯編》,第7冊,頁111-114。

藏人更願意將藏中關係視為檀越關係,這與絕對主權觀之下的中 央與地方隸屬關係無法等同視之。班禪本人在〈西藏政教之始 末〉一文裡,並未去追溯元明兩代西藏與蒙古、中國之間的關 係,而是將此種檀越關係從清代開始談起:「達賴五世及班禪羅桑 缺堅〔按:即六世班禪〕」入京朝謁,清庭〔廷〕以優禮待之,即 為中藏佈施結緣之始。」30更確切地說,清世祖乃是「勒諭達賴班 禪主持西方佛教,互為師徒,承繼宗喀巴衣鉢〔缽〕,闡揚黃 教」, 西藏則「咸尊中國為檀越主」。而他的公署秘書長劉家駒補 充地指出,就政治上來說,自此展開了清廷羈縻西藏的時期。³¹順 此而下,由於康熙五十八年,中國派軍入藏平亂,組織噶廈〔引 按:即西藏政府〕,立四噶倫,「自此西藏全部已受統制於清廷」;32 乾隆時又於廓爾喀之役後改革藏政,因此「此時西藏即為中國之 領土」。³³至於中國所征服的其他西康、雲南邊區藏族人民,在雍 正時,將打箭爐、巴塘、理塘劃隸四川,設置宣撫司、宣慰司、 土千戶、土百戶等;而察木多(昌都)以外土司仍隸西藏,「至是 整個西藏西康全受中國政府之支配」。34

整體來說,由於班禪需得到國民政府在政治上的支持,所以他並未全然否定清朝曾「支配」過西藏。但是,使用檀越關係的表述,就意味著藏中關係並非全然可以以主權關係來涵蓋,而是有著宗教上特殊的含意。

這種檀越關係的觀點,由另一位來自康區女性藏人倫琴拉木 (Rin chen lha mo,?-?)作出更詳細、也更激進的說明。在她 看來,即使是蒙元時代,西藏亦非中國的臣屬,西藏與蒙元中華 帝國乃是「教會與國家之聯盟。西藏為教會,而忽必烈可汗之帝 國為國家」。35到了清代,達賴喇嘛也試圖效法元世祖與薩迦法王

³⁰ 班禪額爾德尼述,劉家駒譯、〈西藏政教之始末〉、《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1:6 (南京,1936.4)、《民國文獻資料叢編·民國邊政史料匯編》,第7冊,頁147。

³¹ 劉家駒,《西藏政教史略》(出版地不詳:中國邊疆學會,1948),頁10。

³² 劉家駒,《西藏政教史略》,頁12。

³³ 班禪額爾德尼述,劉家駒譯、〈西藏政教之始末〉,頁147。

³⁴ 劉家駒,《西藏政教史略》,頁13。

³⁵ 倫琴拉木 (Rin chen lha mo, Mrs. Louis King) 著,汪今鸞譯,《西藏風俗志》(上海

的聯盟關係,與清代新皇帝合作壓服國內反動者;在清帝則是「欲利用喇嘛勢力,助其招納蒙古民族歸順」,使西藏佛教成為蒙古宗教。³⁶因此,即便五世達賴曾自清世祖受領印綬,但是「皇帝之接見喇嘛,如獨立君主,一以敵體相待」。從此,這種政教之間複雜的合作,又在中國、蒙古、西藏之間的互動產生一新問題,「即此帶有政治臭味的教皇之行動,與命運,常為中國蒙古大事」。³⁷雖然,這導致雍正時期西藏併入中國的建置,比如對安多與康區的土司、頭人、活佛加以各種印綬及管理;但這都是屬於「朝貢」而非皇帝屬僚。甚至是乾隆朝於廓爾喀戰爭後的大舉改革藏事,在倫琴拉木看來,西藏內部實際行政未受干涉,中國政府的法規,如金瓶掣籤制度,藏人就未照辦,而是以原有方法選出九世達賴與十三世達賴。更能證明「西藏實際上之自主權」者,是1865年西藏與尼泊爾之「互訂條約未經中國參與」。³⁸倫琴拉木所建立的西藏史,其實已經非常接近夏格巴的觀點。

只是作者的意圖及其希望的文字效果,與讀者的解讀從來都不會是一致。以倫琴拉木此書的譯者汪今鸞為例,他在校譯此書的同時,也會在某些段落加上按語說明;然而,汪今鸞更關注的是倫琴拉木筆下英國人的角色,並指出其「多誣詆我國之語」。反而倫琴拉木對西藏歷史非臣屬於中國的此種表述,汪今鸞並未提出出異議。對於藏人自我的西藏歷史觀,中國譯者及讀者並未提出

商務印書館,1931.10),頁14。原書名為 We Tibetans (London: Seeley service & Co. ltd., 1926),其夫為 Louis Magrath King (1886-1949),曾任英國駐重慶、成都領事。按,倫琴拉木為羅馬拼音直譯,但就藏文轉寫應為仁欽拉姆。由於此處分析的文本為中譯本,因此依照時人譯名稱作者為倫琴拉木。又,本書另一譯本,書名為《余之西藏觀》,內容相同。

³⁶ 倫琴拉木著,汪今鸞譯,《西藏風俗志》,頁19。除了佛教之外,蒙古人的宗教信仰還有傳統的薩滿與伊斯蘭等。認為西藏佛教為蒙古宗教的論述,並不只是倫琴拉木,漢人也如此相信。舉例來說,在史學家呂思勉所著的教科書裡,對「喇嘛教感化蒙古人」而使「漠南北獷悍的遊牧人」「變為馴良」的政治功用大力加以讚賞。見:呂思勉,《初中標準教本 本國史》(全四冊)(上海:中學生書局,1935.6);收入:呂思勉,《呂著中小學教科書五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³⁷ 倫琴拉木著,汪今鸞譯,《西藏風俗志》,頁20。

³⁸ 倫琴拉木著,汪今鸞譯,《西藏風俗志》,頁24-26、30。

異議,這或許說明,漢人不甚在意藏人所表述的漢藏關係,僅給 以冷淡的認知。漢人自歷史中讀到的,是確切不易的主權隸屬關 係與屬於中國固有領土的西藏歷史。

(二)康藏之別與康人自治

不論檀越關係在文字上如何表現,對民國時人而言,西藏問題的危險之處還在於實際上帶來的三次川、康、青與西藏的戰爭。漢藏彼此最重要的爭執在於康區(西康省)的地理與政治歸屬,這涉及到漢、藏之間對於歷史認知的不同。更為複雜的是,藏人內部又因康、藏地域之分,部分康區藏人形成了不同於西藏噶廈政府的主張。³⁹

儘管西藏當局將康區視為西藏政治上的一部分,然而對民國時期旅居中國內地的康人而言,卻非如此。誠如 Melvyn C. Goldstein 所論,儘管康巴(也就是康區藏人)願意獻身於藏族傳統社會、宗教及經濟制度,但康巴卻不願意向拉薩政府承擔沉重的賦稅、差役。且康巴與衛藏之間在文化與語言有相當的差異,康巴也怨恨拉薩官員的歧視、掠奪以及無償的烏拉差役(無償勞役),康巴更難在拉薩取得官職與權力。所以在歷次漢藏邊境的衝突中,康巴都採取騎牆的態度。40

藏人同意西藏有衛、後藏、康區別,並援引現代民族學的概念,藏族即是「圖伯特族,清時稱唐古忒族,民國以後始以藏族稱之」,⁴¹或者將三者統稱為「西藏民族」;同時也接受漢人知識分子關於西藏乃是「古代三危」苗裔⁴²的民族溯源之說法。⁴³不過旅

³⁹ 感謝匿名評審指出本文未對青海安多藏區的部分進行討論。一方面,這涉及同時對漢、藏、蒙、回四個族群在安多的互動,已超出本文的範圍與能力。其次,民國時期漢藏雙方最主要的爭執發生在康區的歸屬,青海則是馬氏家族與拉卜楞藏區的回藏衝突。拉卜楞寺的研究,見:Paul Kocot Nietupski, Labrang: A Tibetan Buddhist Monastery at the Crossroads of Four Civilizations (New York: Snow Lion Publications, 1999).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31-1951: The Tibet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640, 643.

⁴¹ 劉曼卿,《邊疆教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36。

⁴² 三危即三藏的說法起於康熙,將「舜徙三苗於三危」釋為喀木、衛、藏之說,而後士人紛紛加以闡述。見:清·黃沛翹,《西藏圖考》(清光緒20年(1894)京都申榮堂校刊本),卷首,〈宸章〉,頁4B,及卷二,〈源流考〉,頁1A。

居中國內地的康人更特意指出康、藏之間文化上的區別,因此, 格桑澤仁說:「江達以東者土語稱康巴哇〔娃〕,在江達以西者土 語稱藏巴哇。又康藏風俗服飾均稍有區別,且藏人對於康人常相 歧視。藏之軍政各界全不許康人插足。」44值得注意的是,格桑澤 仁等康人一方面訴諸康人的鄉土意識,另方面也以清末趙爾豐 (1845-1911)改土歸流後的史事為根據,主張「康藏原以丹達 山為界,山西為藏,山東為康」。再以此批評清中葉時「不明康中 情勢」,為了「檀越佈施」,而將「康東之膽化〔引按:瞻對〕、康 南之江卡、康西之桑昂等地,因宗教信仰,賞賜達賴 」。⁴5因此在 族群意識與歷史證據的支撐下,康人也同意中國對於康區政治區 劃的主張。康人欲擺脫拉薩政府的控制,康人內向漢地的期望, 也可從親身實地調查來證明。康人馮雲仙(?-?) 46即報告說, 康區東部的人民經過漢藏兩方的比較後,紛紛表示親近漢官。如 得榮縣人民輿論「均言誤信藏蕃,自悔前非」;鹽井縣則報告「人 民因與藏蕃接境,見其殘酷遠過漢官□〔引按:原文不清〕倍, 故對漢官不生惡感」;甘孜縣的情況則是「藏番虐民甚於漢官百 倍,縣境人民對漢官頗愛戴₁。47

此種康人反藏的情緒,又進一步表述為對達賴喇嘛「建設大 藏族政府」的指責。首先,「前後兩藏,自清初以來,已由達賴與

⁴³ 如:劉家駒、〈西藏人民之生活〉、《新亞細亞》、2:5(南京,1931.8)、收入:徐麗華、李德龍主編、《中國少數民族舊期刊集成》,第59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第59冊、頁33;劉家駒、《康藏》(上海:新亞細亞月刊社,1932)、頁7;格桑澤仁、《康藏概況報告》(1932、按、此報告為格桑澤仁在三中全會的報告書)、收入:《民國史料叢刊》、第867冊(封面書名為《康藏》)(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頁142。

⁴⁴ 格桑澤仁、〈西康改省計劃提案〉、《蒙藏委員會公報》、第1-2期合刊(南京、1929:5)、收入:馬大正主編、《民國文獻資料叢編·民國邊政史料匯編》、第8冊、頁174。

⁴⁵ 格桑澤仁,《康藏概況報告》,頁142-3。

⁴⁶ 馮雲仙,藏名格桑雀珍,西康著名女性學者,曾任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制憲國大代表、監察委員等職,其夫為著名藏學家楊質夫。

⁴⁷ 分見:馮雲仙、〈西康各縣之實際調查〉、《新亞細亞》、2:5(南京、1931.8)、 《中國少數民族舊期刊集成》、第59冊、頁93、103、107。

班禪分地而治」。⁴⁸其次,清末經趙爾豐的改土歸流後雖以丹達山為界,不過實際上趙爾豐的軍力已越過丹達山以西,直抵原為前藏轄地的江達,所以民國以來康藏開釁的原因乃達賴欲收復失地。⁴⁹於是「達賴既佔領兩藏,欲將西康亦併吞之,以遂其所謂恢復唐沽忒版圖之願望」,達賴更「欲得英援助,使能達到脫離中國而造成藏族獨立自治之目的」。⁵⁰

為了對抗達賴喇嘛「大藏族政府」的企圖,康人訴請西康建省,⁵¹並結合班禪的號召力,以求在國民政府的中央勢力下擺脫拉薩政府。因此格桑澤仁、宮敦札西等人於1929年8月1日向國民政府請願,「請改康藏為三個行省,以西康原有47州縣為西康省,前藏原有範圍為前藏省,後藏原有範圍為後藏省」。⁵²隔年,班禪並主動向國府表示,「西康民眾近年來備受達賴征斂徭役之苦,傾向敝佛;青海亦久陷於無政府狀態中,並可由敝佛加以領導,以促成該兩地健全之省治。」⁵³班禪的計畫並得到康人的回應。1931年8月,「旅京西康人士」再次呈請西康建省,「至於主席一職……即請委信仰素著、愛戴無二之班禪佛爺充任。」⁵⁴在康人的建省呼籲

48 熊禹治,《解決康藏問題建議書》(出版者、出版地不詳,1931.4),頁2。按,熊禹治雖非康藏人士,但他時任西康諾那呼圖克圖駐蓉辦事處處長,代表諾那上呈此建議書。

⁵⁰ 格桑澤仁,《康藏概況報告》,頁143-145。類似的言論,如:馮雲仙,〈目前西康 興革之要點〉,《新亞細亞》,2:5 (南京,1931.8),《中國少數民族舊期刊集成》,第 59冊,頁76。

⁵¹ 國民政府建政不久,即對北洋政府時期在邊疆設置的特別區域進行行政改劃。1928年8月29日,中央政治會議議決,熱河、察哈爾、綏遠、青海、西康改省;10月17日,中央政治會議議決寧夏改省。見:劉紹唐主編,《民國大事日誌》(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9),頁407、411。

⁵² 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臺北縣新店市:四川文獻月刊社,1971),頁385。

^{53 〈}班禪請求回藏弭止尼藏戰爭事致蒙藏委員會呈〉(1930.4.17),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九世班禪內地活動及返藏受阻檔案選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頁16。按,尼藏戰爭的背景乃是當年西藏與尼泊爾之間因一宗司法管轄權的爭議而交惡,雙方處於爆發戰爭邊緣。

^{54 〈}批西康旅京同鄉請願團呈懸力促實現西康省府並請委任班禪主席一案文 (附原呈)〉,《邊政》月刊,第8期(1931.8)「例載」欄目,頁1-2。按,該刊為川康邊防軍總指揮部所辦,1929年9月創刊,原為月刊,後為不定期刊,至1931年第9期停刊。

裡,諾那活佛的方案更為特別。清代中藏傳統邊界寧靜山一金沙江一線,以東「為各土司分轄地」,「宿隸四川,故稱川邊」,「實非康地」;金沙江以西,由察雅、昌都、八宿、類伍齊「四呼圖克圖分轄者」,「性質迥殊」,所以整個西康應改建為康定與昌都兩省。當然,昌都省政府主席最合適的人選是諾那呼圖克圖。55至於衛藏,為褒獎班禪內向,以及杜絕外人覬覦,應改建為前藏與後藏兩省。56未來如成立青康兩地屯墾軍,「又加以班禪諾那之威望與潛勢力」,那麼,達賴也不得不就範。57

幾乎就在同一時間爆發的康藏戰爭,又為康人呼籲西康建省增加了更多的理由。此次大白事件(按:即發生於 1930 年 6 月引發康藏戰爭導火線的甘孜縣大金寺與白利土司廟產之爭),正是達賴欲「完成整個西藏民族之獨立計畫」。58 由於藏軍已經渡過金沙江,攻下甘孜、瞻對,甚至一度逼近康定。在中央已經派出唐柯三(1882-1950)赴藏交涉的情況下,當「趁此次交涉之際,應嚴飭達賴將前後侵佔西康之各縣全數退還」,59以完成西康固有之省治區域。然而康人目標尚不止於擺脫西藏。

藏方之所以能「用整個西藏民族獨立為號召,並有援助康人自治之宣言」,乃是民國以來治康疆吏壓迫虐民,「處處表現民族間之不平等,故康人迭次反對」。因此,現今西康籌備改省,應以三民主義及民族自決原則來確定康人參政權。⁶⁰換言之,格桑澤仁的矛頭還指向當時實際控制西康的地方軍閥劉文輝(1895-1976)。格桑澤仁乃是1931年4月27日由蔣介石派為西康省黨務特派員,然而在隔年的2月26日,爆發與劉文輝24軍衝突的格桑澤仁

⁵⁵ 熊禹治,《解決康藏問題建議書》,頁1-2。

⁵⁶ 熊禹治,《解決康藏問題建議書》,頁2-3。

^{3′} 熊禹治,《解決康藏問題建議書》,頁5。

⁵⁸ 劉家駒,〈康藏之過去與今後建設〉,《新亞細亞》,3:5(南京,1932.2),《中國少數民族舊期刊集成》,第60冊,頁562。

⁵⁹ 劉家駒,《康藏》,頁111。

⁶⁰ 格桑澤仁,〈西康改省計劃提案〉,《蒙藏委員會公報》,第1-2期合刊(1929.5),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民國邊政史料匯編》,第8冊,頁172。

事件。⁶¹而後當他被召回南京,向三中全會黨中央報告時,極力主 張此次康藏和議的目標是:「所有數十年一切連帶糾紛問題,均應 乘此求整個解決,以期一勞永逸。如西康建省、康藏界線問題, 達賴班禪合作、班禪回藏問題,兩藏治權及統屬問題,西南西北 各省與西藏通商問題等。」⁶²格桑澤仁在事件中打出的「康人治 康」口號,代表藏族康人企圖在西藏與西康地方漢人軍閥之外, 追求第三種權力構成的可能。如同格桑澤仁以在地康人身分對抗 劉文輝者,尚有諾那活佛。在蔣介石支持下,1935年6月,諾那 活佛以「西康宣慰使」身分入康後,除了將劉文輝 24 軍的部分武 裝予以繳械外,並在康北數縣解除由劉文輝任命的地方官員職 務,改派自己所信任的土司與頭人接管地方行政。⁶³康人治康口號 也在幾年後由劉家駒加以運用。為了對抗劉文輝欲併吞班禪行轅 物資與勢力的企圖,班禪行轅衛隊結合地方孔撤土司德欽旺姆, 1939年12月於甘孜與 24 軍駐軍發生衝突。⁶⁴

由於現實的政治實力,以及對日抗戰時期蔣介石需要與劉文 輝取得妥協以安定西南大後方,康人治康的期望不可能實現,⁶⁵格

⁶¹ 關於格桑澤仁事件的來龍去脈,見:黃天華,〈民國西康格桑澤仁事件研究〉,《四川師範大學學報》,36:5 (成都,2009.9),頁117-123。

⁶² 格桑澤仁,《康藏概況報告》,頁40-41。

⁶³ 諾那活佛除了與劉文輝爭奪地盤外,並在蔣介石的信任下,配合中央軍圍剿紅軍。有關諾那此時在康區的活動事蹟,見:馮有志,《西康史拾遺》(康定:中國人民政協會議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94),頁140-161;相關研究可見:王川,〈諾那活佛在內地的活動及對康藏關係的影響〉,《中國藏學》,2008:3(北京,2008),頁121-127;Lin,Hsiao-Ting,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 (Vancouver: UBC Press, 2006), pp. 93-94.

⁶⁴ 此次甘孜事變(亦稱班轅事件)的過程,見:馮有志,《西康史拾遺》,頁325-351;張踐,〈班禪返藏與"甘孜事變"〉,《青海民族研究》,18:4(西寧,2007.10),頁117-121。

⁶⁵ 康人治康與康巴民族主義的號召,也可以得到另一個側面的印證。現代西藏共產黨創始人平措汪杰(Phüntso Wangye, 1922-)曾回憶,在他幼年時,首次對「獨立」、「自治」、「反抗」、三民主義等概念產生感覺,是得自於格桑澤仁的啟蒙,並渴望從事如同格桑澤仁一樣的事業及前往南京就學的志向。同樣的刺激,還來自1935年諾那活佛的回康。甚至,平措汪杰走得更遠,他的目標不只是統一的康區,也是統一的大西藏,這是他成立西藏共產黨一個重要的初衷,見:Melvyn C. Goldstein, Dawei Sherap, and William R. Siebenschuh,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üntso Wangye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9-10, 14-16, 20-21, 54-55, 72。

桑澤仁因而只能藉由藏人代表的身分向國民黨中央呼籲。雖然國 民政府不斷宣示要依三民主義及五族共和來處理邊疆民族的政治 議題,期望將能以平等的政策達成提攜幼小民族、共同開發的境 地。然而,在非漢族群眼中看來,國民黨在邊疆問題上的作為幾 乎與前清時代無異。就在對日抗戰勝利前後,格桑澤仁以其國民 黨代表的身分,在國民黨六大上提案文中,有一段沉重的表白:

試檢討民國以來對待邊民之一般情形,仍多因襲前清專制時代之羈縻政策。有時且有跡近帝國主義者對待其殖民地之作風,漠視邊民福利,抹煞邊民意見。致使外蒙與西藏各自為謀,內蒙及新青康等地糾紛未已。66

對漢人官吏的批評,同樣也出於來自西康的藏人代表羅哲情錯(1909-1949,按,其夫為康藏史地學者任乃強)。她指責治康的漢官「抱守『用夷變夏』的金科玉律」,「推行漢化教育與漢地建設」;⁶⁷漢官調解蕃人冤仇的技術,「便是貪污與欺騙」,⁶⁸漢官乃是「世上最無信義的人」。⁶⁹為了打破漢蕃間官民的隔閡,她在國民大會上提出〈請以法律規定邊民參政權益案〉,要國民政府中央確立邊政統治的原則,「懂不得邊民語言文字與其生活習慣的便不得在邊地作公務員。而邊民之能瞭解漢情懂得漢文漢語,足以打通政府與邊民之隔閡者必有他政治上的出路。」⁷⁰也就是說,羅哲情錯謀求康人政治權益的方案,是在國民政府憲政架構的前提

⁶⁶ 格桑澤仁,〈向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提案「根據主義政綱請明確承認國內各民族之民族地位,予以應得之權利案」全文〉,格桑澤仁,《邊人芻言》(重慶:西藏文化促進會,1946.11),收入:張羽新、張雙志編纂,《民國藏事史料彙編》,第19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頁179。

⁶⁷ 羅哲情錯,〈我在國民大會的提案〉,《康藏研究月刊》,第20期(成都,1948.5), 收入:姚樂野主編,《《康藏前鋒》《康藏研究月刊》《康導月刊》校勘影印全本》, 第6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1),頁3758。

⁶⁸ 羅哲情錯,〈我的家鄉(續)〉,《康藏研究月刊》,第28-29期合刊(成都,1949.8-9),《《康藏前鋒》《康藏研究月刊》《康導月刊》校勘影印全本》,第7冊,頁

⁶⁹ 羅哲情錯,〈我的家鄉〉,《康藏研究月刊》,第27期(成都,1949.7),頁4007。

⁷⁰ 羅哲情錯,〈我在國民大會的提案〉,《康藏研究月刊》,頁3760。

下。不過,康區藏人也有謀求另一種更激進的想法。

戰後,面對外蒙古的獨立成為現實,以及蔣介石公開表示西 藏可以追求自治的言論, 71格桑澤仁針對藏人與整個西藏在國家內 的地位提出與他此前所曾提出的不同看法。作為藏人的中央代 表,格桑澤仁的官方身分超越西康而涵蓋整個藏區。但是,一方 面西康實際上為漢人軍閥劉文輝所掌握,另方面西藏政府也不會 承認格桑澤仁具有代表西藏的身分。因此,格桑澤仁除了在出席 第四屆國民參政會上提請「將藏族名稱改為『博族』以資正名」72 之外,他反而訴諸於回到傳統藏人的地理概念,主張需依此來劃 分行政單位。「為迎合國際新趨勢,順應蒙藏輿情」,「擬請將蒙藏 各地依照其舊有制度之劃分」「而設立蒙藏各自治區」,外蒙、西 藏各設為「特別自治區」,而「康青川滇甘五省境內藏族區域,分 設為『喀木』『安多』兩個自治區」。⁷³如此一來,自治區的建置將 否定現行以西康省為區劃的行政單位,「喀木」自治區一方面將是 三個地位平等的藏人行政單位之一,另方面作為博族自治單位, 又不同於以前康人治康口號下狹隘的省籍意識,而具有「少數民 族」參與全國性政權的特別意義。以藏人的眼光來說,格桑澤仁 的主張將比國民政府現行行省制度下空泛的五族共和、平等提攜 更具有自主性與前瞻性。

事實上,格桑澤仁希望正名族稱的呼籲,還隱含著直接挑戰 國民政府官方的民族政策。這牽涉到「中華民族」與「五族共

⁷¹ 蔣介石表示:「西藏民族的政治地位,也是久懸未決的問題,我可以負責聲明,如果西藏民族此時提出自治的願望,我們政府亦必將賦予高度的自治。如果他們將來在經濟條件上能夠達到獨立自主的時候,我們政府亦將如對外蒙一樣的精神扶助他們的獨立。」見:蔣介石,〈完成民族主義維護國際和平(1945年8月24日主持中央常會、國防最高委員會聯席會議講)〉,收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1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頁172-173。

⁷² 格桑澤仁,〈出席第四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提案與講話·(二)提案審三第五七號「請將藏族名稱改為『博族』以資正名」全文〉,《邊人芻言》,《民國藏事史料彙編》,第19冊,頁184。

⁷³ 格桑澤仁,〈出席第四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提案與講話·(三)提案審三第三五號「請確立蒙藏自治區制度載諸憲法草案案」全文〉,《邊人芻言》,《民國藏事史料彙編》,第19冊,頁185。

和」的區別。國民黨所主張的民族主義,乃是依循其體系創建者 孫中山的建國藍圖。雖然孫中山曾一度接受過五族共和的主張, 然而在 1919 年之後,孫中山轉而徹底反對,從而主張構成中國的 民族組成,必須是「將漢族改為中華民族,組成一個完全的民族 國家」。⁷⁴也就是將其他滿、蒙、回、藏同化於漢族而成為單一中 華民族所構成的民族國家。⁷⁵

在藏人而言,「中華民族」一詞所指向的乃是種族的同化,「五族共和」的修辭在表面上看來,至少存在著地位平等的藏族。正是在這個意義下,藏人才願意訴求漢藏一體與五族共和。反之,擁護一個中華民族將意味著藏人會失去其政教合一的獨特歷史傳統。在格桑澤仁看來,中國境內只有蒙、藏、回三民族才是真正的民族,中國邊疆問題也等於是蒙、藏、回的問題。為了更正確地使用命名,「回」應改為維吾爾族、維族、突厥、突厥斯坦族。而「藏」這個名詞,應當改為藏人自稱的「博」。如此一來,不只是名為「西藏地區」的行政區劃(在國民政府的政治版圖而言),居住在青海、甘肅、西康、雲南等地的藏人也都是一個以「博」為民族名稱的同一群體。76這顯示同化意味極強之中華民族的概念,對非漢族群而言,並不具說服力,含混的五族共和,反而更受歡迎。

^{74 〈}在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的演說〉(1921.3.6),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474。

⁷⁵ 除了感受到1919年五四運動中高漲的民族主義風潮外,對孫中山來說,五族共和蘊含著一種可能性——多民族演變成多個民族主義的危險。關於孫中山對五族共和一詞的使用,及從五族共和主張轉向提出中華民族概念的過程,見:村田雄二郎,〈孫中山與辛亥革命時期的"五族共和"論〉,《廣東社會科學》,2004:5(廣州,2004),頁 121-128;林冠群,〈試論孫文「五族共和」思想〉,《中國邊政》,169(臺北,2007.3),頁1-17;劉曉原,〈從「五族共和」到五域統合——辛亥革命與中國國家形態近代轉型〉,「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會議論文(臺北:國史館,2012);松本ますみ,《中國民族政策の研究——清末から1945年までの「民族論」を中心に》(東京:多賀出版,1999),頁95-106;王柯,《20世紀中国の国家建設と「民族」》(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6),頁92-109。

⁷⁶ 格桑澤仁,〈自我介紹(代序)〉,《邊人芻言》,《民國藏事史料彙編》,第19冊,頁 173。

然而,即使是「五族共和」,九世班禪對之的態度也顯得曖 昧。雖然在中文文獻中,班禪首次使用「五族共和」一詞是在 1925年2月〈班禪致善後會議消弭戰禍實行五族共和意見書〉"一 文中,時間點上似乎是班禪剛由後藏流亡至中國內地不久,國民 黨所主張的中華民族之意識型態還未取得主導權。但是,1933年 班禪至南京宣誓就職西陲宣化使後,他在蒙藏委員會紀念週上發 表題名為「西藏歷史與五族聯合」公開演講。有趣的地方即在 此,面對當時康、青兩省與藏方戰後的糾紛,班禪認為,康、青 兩省,其實皆為傳統蒙藏區域,「藏之名詞有大藏小藏之分,大藏 即為西康,而青海之南,多屬西康民族」。78換言之,班禪或許暗 喻著作為地理與族群名稱的「藏」,是在地位平等且特殊的條件 下,成為五族聯合的一員,而大藏、小藏的區分,甚至可進一步 聯想到英國在西姆拉會議中所提出的「內藏」與「外藏」之分。 此外, Gray Tuttle 在比對過中文與藏文兩方文獻後指出, 班禪也 只有在公開演講中才會提到五族共和及孫中山,檢視關於班禪的 藏文資料,他發現班禪並不提五族共和,較接近的用詞是信佛的 「漢藏蒙」三者,也不見班禪使用「民族」這個字眼。這說明班 禪其實是有意識地抗拒「五族共和」這個意識型態與修辭。⁷⁹

不論如何,此時旅居中國內地的藏人,多少還是擁護西藏為中國一部分的主張。然而,在中國正進行民族國家的同一化與現代化的改造過程裡,必然牽涉到對「阻礙」邁向現代化的診斷。 西藏尤其與中國內地的發展差距甚大,因此,除了指責帝國主義的干涉之外,西藏本身也須為落後狀態的根源負責。「喇嘛教」的 迷信,以及藏人婦女的奇怪習俗,都是有待剷除的「封建」產物。但是,面對漢人對西藏文化的這些指責與詮釋,藏人就很難

77 〈班禪致善後會議消弭戰禍實行五族共和意見書〉,《九世班禪內地活動及返藏受阻檔案選編》,頁3-4。

^{78 〈}班禪在蒙藏委員會紀念週發表〈西藏歷史與五族聯合〉演講〉(1933年1月21日),《蒙藏旬刊》,第88期(南京,1934.8),收入:徐麗華、李德龍主編,《中國少數民族舊期刊集成》,第32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30。

⁷⁹ Gray Tuttle, *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28-155.

同意。

三、西藏佛教的捍衛與西藏婦女的地位

(一)「喇嘛教」?還是西藏佛教?

就漢人看來,西藏文化落後已無可置疑。清末,在英軍入侵、達賴出走之後,張蔭棠(1864-1935)開有清以來首位以漢人大臣身分奉派入藏查辦藏事。⁸⁰他於 1907年提出〈傳諭藏眾善後問題二十四條〉,又頒發〈訓俗淺言〉、〈藏俗改良〉小冊。特別針對藏人不知衛生、婦女不重貞潔、傳統葬俗、喇嘛不營生業與迷信等事,訓勉藏人。由於「藏民愚蠢」,務須「廣興教育」「以開民智」,⁸¹並曉諭藏人要以中國古學與中國新學改進。⁸²

這種藏人落後、不合於現代社會的觀點,屢見於關心邊疆議題的漢人菁英之言論;同樣地,也表現在民國時期藏人的著述與藏人所辦的刊物裡。劉家駒即指出:「西藏自古迄今,以佛教立國……人民馴樸,智識簡陋,工作食息而外,懵然不知所求」。⁸³在一篇轉載自《大公報》的報導裡,記者長江〔按:即范長江(1909-1970)〕訪問當時甫自西藏歸來的黎丹(1865-1938)⁸⁴,記者以非常具有對照性的筆法作全文的開場白:

在中國資本主義最高峰的上海,在上海資本最集中的南京路的先施公司東亞旅館五層樓上,訪問幾位從喜瑪(馬)

80 張蔭棠的簡傳,見:吳豐培、曾國慶,《清代駐藏大臣傳略》(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頁262-274。

⁸¹ 清·張蔭棠,〈傳諭藏眾善後問題二十四條〉,《張蔭棠駐藏奏稿》,收入:吳豐培編輯,《清代藏事奏牘》,下册,《西藏學漢文文獻匯刻》第三輯(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頁1336。

⁸² 清·張蔭棠,〈訓俗淺言〉,《張蔭棠駐藏奏稿》,《清代藏事奏牘》,下册,頁1353、 1355。

⁸³ 劉家駒,〈康藏之過去與今後建設〉,《新亞細亞》,3:5(南京,1932.2),《中國少數民族舊期刊集成》,第60冊,頁563。

⁸⁴ 黎丹,字雨民,湖南湘潭人,長年追隨馬麒,1930年馬麒出任青海省主席,以黎丹為省府委員兼秘書長。1934年5月,黎丹自青海省率西藏巡禮團到西藏進行訪問,與楊質夫留居哲蚌寺,拜喜饒嘉措為師。1937年,黎丹陪同喜饒嘉措離開西藏,經印度轉赴南京。

拉雅山北面游牧經濟、神權政治、半母系社會的西藏地方 新來的貴賓,是多麼令人起社會史上的遐思......⁸⁵

「游牧經濟」、「神權政治」、「半母系社會」,這些詞彙都指向意味著落後的前近代社會。正如漢人對西藏一直以來乃是文明落後的普遍觀感,旅居中國內地的藏人也接受此一觀點。與中國相比,西藏「不尚競爭,閉關自封,故文化較諸內地實覺落後多矣」。⁸⁶ 進而深切期盼能在標榜五族共和的國民政府領導下,提攜西藏,開發資源,以求晉昇至現代文明國度。

即使是班禪也同意,與中國相比,西藏確實「仍」生活在現 代工業文明之前的時代。1935年初,當两陲盲化使公署在內蒙阿 拉善旗正式成立後,班禪於寧夏、甘肅、青海等地執行國府賦予 他宣化蒙疆的任務,並啟建香巴拉加隆法會。途中亦受寧夏省主 席馬鴻逵、甘肅省主席朱紹良、青海省主席馬麟等人之激,至銀 川、蘭州、西寧等處訪問。在為他舉辦的歡迎會上,班禪以同是 蒙藏少數民族的地區,卻在時代的進步上出現差異而表達自己的 感想。自1923年底從後藏出走後,他曾經過這些地方;現在再次 宣化考察,20年前的寧夏,本與蒙藏青康一樣落伍,經過省主席 的努力,寧夏現在成了西北上的繁華商埠;20年前寧夏仍處於游 牧生活,現在土地變成熟土、森林與城市。反觀西藏,過去「無 法明瞭國家的政情和國際間的情勢,與沂代科學的淮步,所以看 不見自身的危險」,加上「西藏素抱閉關思想」,「自己又無建設的 能力,往往足以引發他國的覬覦」。87他比較的對象,並不是如南 京、上海等東南沿海,而是同屬少數蒙回族民聚居的西北蒙疆。 只是班禪此時是以他在1923年離開西藏的印象,來作為他1935年

^{85 「}記者訪問黎丹(雨民)旅藏三年」、《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1:9(南京、1937.5)、「邊疆要聞」欄目、《民國文獻資料叢編・民國邊政史料匯編》、第7冊、頁514。

⁸⁶ 劉家駒,〈西藏歷代藏王及達賴班禪史要〉,《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1:4-5(南京,1936.3),《民國文獻資料叢編·民國邊政史料匯編》,第6冊,頁570。

^{87 〈}西陲宣化使講鞏固國防當以交通入手〉,《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創刊號(南京,1935.5),頁113-114。

當下與寧夏相比較對象,至於西藏同一時間是不是也開始有自己建設自己的能力,他並未指出。

藏人或許亦能同意現時的西藏是落後的這種觀點,西藏的政治、文化、風俗、習慣,在當今社會來說,「依然保守著固有的成分」。然而「神密(秘)的佛教,他的進步,非常勇猛,如風馳電掣似的前進」。⁸⁸班禪身為西藏政教兩大活佛之一,本人自然即認為「西藏宜行政教合一制度」,「因全藏人不分老少僧俗,無不宗奉佛教」。⁸⁹事實上,對藏人來說,中國知識菁英越是攻擊西藏佛教與喇嘛,就越是引起反感。格桑澤仁對此說道:

許多國內學者先生們,常常憑著他們的直覺,善意的向康藏人說:不要去當喇嘛,並且喇嘛的政權也應該讓他交出,否則你們的人口日減,社會永遠不會進步。不知這話說出,不惟毫無用處,而且足以引起反感。90

他更進一步對這種種族上的偏見,給予文化相對論的回擊。 確實如普通常論所言,邊疆少數民族「現代的科學文化落後,固屬事實」,但如果是去掉西方科學,以傳統來比較傳統,蒙藏回族 「固有文化,無論宗教哲學文學美術,均甚普遍。一般民眾的識 字率也並不比內地低」。至於說到歷史,「蒙古的成吉思汗時代, 西藏的吐番(蕃)王松村噶不(松贊干布)時代,都有其煊赫的 紀載。」⁹¹言外之意,那些批評邊疆民族落後而無現代化的言論, 其實都忘了,與西方相比,近代以前的漢人社會也一樣是處於前 近代的狀態。甚至,就知識上而言,邊人還更加國際化:

少數內地人,抱著一種偏見,以為不懂漢文漢語的邊疆

⁸⁸ 羅桑益西,〈西藏的四月節〉,《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1:6(南京,1936.4),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民國邊政史料匯編》,第7冊,頁143。

⁸⁹ 班禪,〈西藏政教之始末〉,《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1:6(南京,1936.4),《民國文獻資料叢編·民國邊政史料匯編》,第7冊,頁147。

⁹⁰ 格桑澤仁,〈參加教育部邊疆教育坐(座)談會講話〉,《邊人芻言》,收入:《民國藏事史料彙編》,第19冊,頁182。

⁹¹ 格桑澤仁,〈參加教育部邊疆教育坐(座)談會講話〉,頁180。

人,一定不是智識份子。我試舉一例,近年由藏前來內地的東本格西,喜饒嘉錯格西等……只要有一個好的通譯……可以與內地學者討論很深奧的哲理,及一般東方歷史文化……且能用梵文或阿拉伯文,與外國學者談論……92

也就是說,如果跨越語言的障礙,那麼對藏語文而言,漢語文就不再是處於主體地位的強勢語言;其所承載的藏族文化,也同樣具有普世主義的性格。

實際上,極少藏人會使用「喇嘛教」這一帶有貶抑意味之詞。在以中國內地為活動舞臺的藏人菁英筆下,如馮雲仙於康區實地調查報告裡,都是使用「佛教」來指稱藏人的宗教信仰;⁹³曾代表蔣介石首度入藏的藏人女特使劉曼卿(1906-1941)⁹⁴也只說

⁹² 格桑澤仁,〈參加教育部邊疆教育坐(座)談會講話〉,頁182。然而,有趣而又值得深思的是,雖然格桑澤仁指出了漢人在種族主義上根深蒂固的偏見,然而他自己卻也無法免於自己的批評。在同一座談會上,當他提到西南苗瑤夷的語言教育問題時,他卻是主張對這些西南非漢族群可以採用國語化的政策,原因是他們不像蒙藏回一樣「有相當文化與歷史」,「佔據著中國的西北廣大國土」,而「兼有國際性」。見同書頁183。

⁹³ 馮雲仙,〈西康各縣之實際調查〉,《新亞細亞》,2:5(南京,1931.8),《中國少數民族舊期刊集成》,第59冊,頁83-112。

⁹⁴ 劉曼卿,藏名雍金。父劉華軒為拉薩漢回,清末任駐藏大臣聯豫秘書,後曾為九 世班禪行轅秘書;母為四川康定藏人。而劉曼卿自己在《康藏軺征》則以藏人自 承。1915年,舉家遷居印度。1918年,隨父經海路抵京,入學北京第一小學,後 轉入通州師範學校。畢業後,入道濟醫院為護士。志在「回歸西藏,提倡改良康 藏女界生活,以期漸次促進于文明」。1928年,十三世達賴喇嘛派五台山寺院堪布 羅桑巴桑喇嘛至南京,鑒於語言不通,時劉曼卿剛供職蒙藏委員會,羅桑巴桑遂 聘劉曼卿為翻譯,赴寧見蔣介石。在接見談話過程,蔣對劉曼卿大為讚賞,委為 國民政府一等書記。1929年,因甘孜縣白利、大金寺事件引起戰爭,藏軍向川軍進 攻。國民政府因而決定派代表赴藏,劉曼卿遂自告奮勇,請求任使赴藏。7月出發, 1930年2月抵拉薩,停留三個月期間,獲得達賴喇嘛兩次接見。1930年8月回至南 京復命,向國府中央帶回達賴有心內向的消息。1932年,第二次考察康藏,受阻 於雲南麗江。此後,與黃警碩等一同發起成立「中國邊疆學會」。1937年中日戰 起,先後組織「康藏旅京同鄉抗日救國會」、「康藏民眾抗敵赴難宣傳團」、「西康 民眾慰勞前線將七代表團」,從事宣傳慰問工作。1941年,因病去世,終年35歲。 參見:劉曼卿,《康藏軺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鉛印本),收入:吳海鷹 主編,《回族典藏全書》,第235冊(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銀川:寧夏人民出版 社,2008),頁23-27;丹珠昂奔主編,《藏族大辭典》(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2003), 頁465,「劉曼卿」等。

「藏民多篤信佛教」。⁹⁵劉家駒指出,對藏人而言,「喇嘛」的意思等於漢語中「和尚」一詞,當然不能用「喇嘛教」來稱呼藏人信仰的佛教。他進一步解釋康藏男性多為喇嘛的原因:一,同一家庭內兄弟其中一人入寺;二,入寺為僧有供養,可不勞而獲;三,喇嘛死後,若無人繼承,則財產歸寺,故喇嘛家人會想辦法派出繼承人為僧;四,喇嘛受人尊敬,在家總攬家政,對外保護家族,社會給予特殊權利。⁹⁶

即便如此,面對漢藏之間文化的顯著差異,藏人自身對西藏佛教也有兩面性的情結。就歷史而言,佛教傳入後,尚武之「西藏民族」因佛教而變為慈祥溫文之民族。⁹⁷但是,「受佛教之感化,迷信報應之說,相沿日久,故民族天性一變而為純良」,從而「思想幼稚,素抱閉關主義,依戀故土」。⁹⁸對於漢人的指責,格桑澤仁雖然一力捍衛,並指出對於西藏,是無法用政治力量去強制他們不要信奉佛教,只能漸進引入三民主義;然而格桑澤仁卻也矛盾地指向未來:「西藏、蒙古的活佛是神權的末日,時期一到了,無論怎樣維持,都不能保守長久。」⁹⁹此種矛盾複雜的情結,還表現在評價趙爾豐推行改土歸流的事業上。

不論在康區或衛藏,在多數藏人心中,趙爾豐的形象是屠夫,甚至痛恨於他對佛教寺院的迫害。1937年受聘至北大、清華等校講學的喜饒嘉錯(1883-1968)格西,即特地指出漢藏幾千年的關係,乃因清末殺僧毀寺而引起藏人的仇漢,「二十餘年來漢藏

⁹⁵ 劉曼卿,《邊疆教育》,頁39;同樣的,在《康藏軺征》一書裡,她亦未使用「喇嘛教」一詞。

⁹⁶ 劉家駒,《康藏》,頁39-40。

⁹⁷ 劉家駒,《西藏政教史略》,頁7。將宗教視為馴化藏族的看法,並不起於劉家駒, 其實從乾隆的「喇嘛說」起即以政治上的效用來看待「喇嘛教」。然而,這並不真 的代表所謂民族性的溫文與否可歸結到某種宗教信仰。乾隆的說法,見:〈高宗純 皇帝御製喇嘛說〉,文收清·不著撰人,《衛藏通志》(續修四庫全書據袁昶輯刊漸 西村舍叢刊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首·御製詩文〉,頁 27b。按,本書成書於嘉慶初年,作者及編纂者未能確定。

⁹⁸ 劉家駒,《康藏》,頁24。

⁹⁹ 格桑澤仁,〈西藏佛教之勢力與三民主義之推進〉,《康藏前鋒》,1:9(南京,1934.5),收入:徐麗華、李德龍主編,《中國少數民族舊期刊集成》,第33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138-139。

感情的疏遠,其原因在此」。¹⁰⁰然而,正是由於趙爾豐在康區巴塘開辦新學,「文化的新苗」「已種在蚩蚩學子們的腦裏」。¹⁰¹劉家駒與格桑澤仁都極力讚賞趙爾豐推行新式教育的舉措,而包括他們兩人在內的少部分藏人都受惠於此,從而找到進入中國內地政治舞臺的機遇。在 30 年代,這些在地的新興康區藏人精英階層一邊強化與國民政府之間的聯繫,同時摸索著康人在政治上的自主性。受到 20 年代「川人治川」地方自治風潮的啟發,這些藏人精英也揭起「康人治康」來對抗劉文輝。¹⁰²對現代教育的期待,同樣也投射在代表入侵勢力的西方教會學校。劉曼卿於赴藏途中在巴塘考察時,特別注意到華西教會學校,雖然康藏人士因「佛教思想深入腦筋」,「受基督教洗禮者寥寥無幾」;但是,「現今西康所有智識份子多半出身教會學校。」¹⁰³

面對現代化的現實要求,藏人這種對於傳統藏文化的兩面情 結並非特殊;中國文化菁英同樣也在思索傳統中國文化要如何回 應西方現代性。但是,在儒家文明而言,傳統藏文化最令人難以 費解的,則是其婦女的地位與違背五倫秩序的奇風異俗。由於藏 人社會裡存在一妻多夫制的情況,這成為漢人眼中藏人社會野蠻 的首要印象。

(二) 西藏婦女與一妻多夫

張蔭棠在〈傳諭藏眾善後問題二十四條〉裡,除去當時首要 辦理善後事官外,還針對藏人的文化習俗提出應改進的三條。第

¹⁰⁰ 喜饒嘉錯,〈從溝通漢藏文化說到民族融合漢民族〉,《海潮音》,19:10(重慶,1938.10),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99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6),頁76。

¹⁰¹ 劉家駒,〈折多雪山與西康青年〉,《新亞細亞》,3:4(南京,1932.1),《中國少數民族舊期刊集成》,第60冊,頁399。

Peng, Wenbin, "Frontier Process, Provincial Politics and Movements for Khampa Autonomy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Lawrence Epstein (ed.), Khams pa Histories: Visions of people, Place and Authority (Leiden, Netherlands; Boston Mass.: Brill, 2002), pp. 57-84.

¹⁰³ 劉曼卿,《康藏軺征》,頁134-135。至於格桑澤仁對趙爾豐及華西教會學校推行新式教育的肯定,見格桑澤仁,〈參加教育部邊疆教育坐(座)談會講話〉,《邊人芻言》,《民國藏事史料彙編》,第19冊,頁183。

二十一條為「女人首重貞潔,只宜管理家務、紡織細工」,「一婦宜配一夫」;第二十二條是「潔淨為衛生之要義」;第二十四條則針對佛教,提出佛教「原不禁人娶妻生子食肉」,「喇嘛仍可充農工商兵諸業」。¹⁰⁴為了要讓藏人依照漢人禮儀改造原本的兩性分工,在〈頒發訓俗淺言〉中就五倫「夫婦有別」一項,張蔭棠要藏人務須「夫在外謀生計,婦在內理家務,各有分別」。¹⁰⁵而在〈頒發藏俗改良〉中,對婚俗與婦女貞潔提出更具體的條目,分別是:「一婦只配一夫,兄弟不得同娶一婦」、「不得私通苟合」、「不得同坑臥宿」、「夫死,其婦宜留以侍養翁姑,撫育兒女,不宜改嫁」、「婦人配定一夫之後,必不可與人偷合」;甚至針對兄弟共妻的後果給以達爾文主義的解釋:「兩兄弟同娶一婦,則生育子女必寡」,「生齒日寡則國弱」。¹⁰⁶

此種對西藏婦女的負面看法,在民國時期漢人的筆下,更發揮為獵奇與淫亂的意象。在一本極為流行、署名為陳重生所著的《西行豔異記》裡,作者極大地發揮其色情化的想像,不斷重複地描寫蕃夷女子性關係上的混亂。¹⁰⁷少數幾位具有中文書寫能力的西康女性藏人對此種描寫藏女可隨意伴宿的意淫想像特地加以撻伐。一位家鄉為瀘定縣的西康女性,即感到忿忿不平,雖然康女「智識雖不高,但是牠(引按:原文如此)們的能力卻與男子一樣」,在「還帶點母系社會的模樣」裡,「有相當的地位和權威,所以西康的姊妹們也比較自由,不過一般人不明瞭這種情

¹⁰⁴ 清·張蔭棠,〈傳諭藏眾善後問題二十四條〉,吳豐培編輯,《清代藏事奏牘》,下册,頁1336-1337。

¹⁰⁵ 清·張蔭棠,〈頌發訓俗淺言〉,吳豐培編輯,《清代藏事奏牘》,下册,頁1353。106 清·張蔭棠,〈頌發藏俗改良〉,吳豐培編輯,《清代藏事奏牘》,下册,頁1355-1357。

¹⁰⁷ 陳重生,《西行豔異記》(上海:上海時報社,1940.6,重印本)。該書於1930年2月起於上海《時報》連載。實際上作者真名似為陳重為,並依康藏史地學者任乃強(1894-1989)的考證,其人未曾至西康,乃集多數西人游記編纂而成。見:張蓬舟,〈陳重為·西行艷異記·及其他〉,《康藏前鋒》,1:2(南京,1933.10),《中國少數民族舊期刊集成》,第32冊,頁29-31;以及:任乃強,《西康圖經·民俗篇》(南京:新亞細亞學會,1934),頁128。關於此書,受限於篇幅與文章主旨,需另文加以探討。

形,就說我們西康女子這樣那樣……太侮辱我們女子」。¹⁰⁸另一位女性作者,則以感到恥辱的辯白回擊那些捏造諸如一妻多夫制、說西康的奇異風俗習慣者,都是知識缺乏、任意胡說、沒有親自去過的人。¹⁰⁹然而,「帶點母系社會的模樣」的文字,其實表明,處於弱勢的被表述對象,即使是反身批判強勢的表述者,仍須依從於主體者所建構的知識架構之內。同樣是西康藏人的馮雲仙,在一份實地調查報告中,是同意在西康的部分地區,「招贅之風盛行」,所以土民家庭「純以女子為主體」;因招贅而行兄弟共妻,甚至「母女共夫」,或「招贅一人,即妻全家婦女」。¹¹⁰

如果對空洞而又印象化的「共夫」、「招贅」這些語詞做進一步的認識,劉曼卿會說:「西藏女子地位甚奇特」。一方面無政治地位,另方面「經濟能獨立,而行動又非常自由」。但是此種自由帶有社會性的區別,在平民女性中較顯見,至於貴族女眷於待人接物皆有定制,不能違長輩、丈夫之命。¹¹¹劉家駒則指出其中緣故:

西藏各地苦於徭役,故一家有三四弟兄者,常共娶一妻,惟必經兩家父母同意……俾免縣中加派門戶差徭;一面可使家中和睦,不致發生分家及妯娌之爭……但此風多行於無產階級。近年民智漸開,除荒僻鄉村外,均無共妻制度矣。112

¹⁰⁸ 張朝麗,〈我的家鄉〉、《康藏前鋒》、4:8-9(南京,1937.3)、《中國少數民族舊期刊集成》,第35冊,頁662-663。

¹⁰⁹ 丹珍,〈西康鑪霍縣概況〉,《康藏前鋒》,3:6(南京,1936.2),《中國少數民族舊期刊集成》,第34冊,頁609。倫琴拉木以更具有現代主義的語言指出,西藏男女兩性彼此「相待平行」,一妻多夫制並非事實,而一夫多妻制則希罕。見仁欽拉姆著,汪今鸞譯,《西藏風俗志》,頁93。

¹¹⁰ 馮雲仙,〈西康各縣之實際調查〉,《新亞細亞》,2:5(南京,1931.8),《中國少數民族舊期刊集成》,第59冊,頁102、111。

¹¹¹ 劉曼卿,《康藏軺征》,頁200-201。

劉家駒,《康藏》,頁74。即使同是藏人,對於西藏政府的差役負擔,也有不同的報導。1934年隨黎丹入藏的楊質夫,在其日記中指出:「西藏政府一切差役均由女戶充當,男子多數為僧,所餘者均出外營生,故一切家務均由女子操持」。見:楊質夫,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上)〉,《中國藏學》,2008:3(北京,2008),頁212。

也就是說,「共妻」有經濟上的理由,且有社會階層分佈上的限制,劉家駒特意強調共妻只限於農民無產階級。但同樣來自藏人的報告,卻給出不同的印象。華西大學邊疆研究所研究員、藏人謝國安(1887-1966)¹¹³認為,此種風俗主要存在羌塘草原的牧民。羌塘人的婚姻習慣有自由戀愛與父母聘娶兩種,但因經濟環境與社會習尚,也有一妻多夫之事。¹¹⁴劉曼卿也對「多夫」一事感到不解,因此在拜訪了西藏首席富商邦達昌家族後,以其兄弟共妻一事相詢,邦達昌對此解釋為「家產聚而不散」;有趣的是,劉接著以中國內地人對此惡評相告,邦達昌反訕笑「多妻何異于多夫」。¹¹⁵

在這個反問的背後,透露了漢人之所以對多夫制加以種種光怪陸離渲染的心理,即多夫制的後果是極大地違背男性宗法社會下五倫秩序的正常運行。因此,在一篇接受北平《世界日報》記者專訪報導裡¹¹⁶,劉曼卿澄清,西藏的社會仍是以男子為中心,多夫制僅限於兩兄弟同娶一媳。其形成的首要原因是:藏人極為注

謝國安,藏名作巴多吉、多吉卓巴,英文名(教名)智慧保羅、保羅・夏熱甫 (Paul Sherap),四川甘孜人,父為蒙人、母為藏人。幼年喪父,10歲離家,先於 拉薩哲蚌寺學經半年,後入大吉嶺瑞典教會所辦寄宿學校學習英文、梵文與藏 文,並受洗。15歲隨德格竹慶寺喇嘛從印度經尼泊爾,至羌塘、阿里等地朝聖兩 年多。1912年夏取道印度回國設館康定,教授藏文。1926年,由謝國安口述、英 國駐打箭爐領事孔貝 (G. A. Combe, 1877-1933) 所著A Tibetan on Tibet 在倫敦出 版,被譽為「詳實可信之作」。1930年代,任教於打箭爐國立師範學校與康定師範 學校藏文教師。1944年,由華西協合大學華西邊疆研究所聘為研究員,為中國最 早研究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學者。1946年與任乃強等組織康藏研究社,出版 《康藏研究月刊》,發表多篇論文。1950年,任中共西南局西藏工作委員會研究室 藏事顧問,隨軍赴藏,調任西藏軍區幹部學校藏文教授。1966年病逝北京。其女 婿為藏學專家劉立千。時人多稱謝氏為藏族學者;但據任新建的簡介,謝國安自 稱蒙古族霍爾巴。參見:王堯、陳慶英主編,《西藏歷史文化辭典》(杭州:西藏 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謝國安」,頁 292-293;郭卿友編著, 《民國藏事通鑒》(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頁618;任新建,〈康藏研究 社介紹〉,《中國藏學》,1996:3(北京,1996),頁29。

¹¹⁴ 謝國安、〈再談羌塘風俗〉、《康藏研究月刊》、5(1947:2)、《《康藏前鋒》《康藏研究月刊》《康導月刊》校勘影印全本》、第6冊、頁3277。

¹¹⁵ 劉曼卿,《康藏軺征》,頁137。

¹¹⁶ 鎔青,〈西藏女子實行多夫制之原因 注重宗族血統 保留遺產制度〉、《世界日報》 (北平),1928年11月4日,第8版「世界要聞」。

重宗族血統,維繫家系傳承,多夫制能團結家庭內兄弟的意志,避免分家。劉曼卿也以男女平等的立場來質疑漢人,內地的娶妾多妻制與西藏的多夫制,都是同樣的罪惡。最後,劉曼卿還詰問漢人文本裡真實性的問題。西藏雖然是中國版圖,但是中國並無「何種詳細調查」,所以她要讀者多參考英人、日人的書籍。¹¹⁷

儘管藏人多方澄清,然而對於康藏女性色情化的印象並未就 此消失。康藏史地學者任乃強縱使在其著作中批駁陳重生對於可 隨意使西番女伴宿的情節;然而,他亦認為,西康「淫亂之俗, 實較世界任何民族為甚」。¹¹⁸在想像藏女淫亂的同時,漢人並未將 過去苗女善蠱的想像一併投射在藏族女性上,也就是說,做為異 族女性的藏人,並不像過去所遭遇的邊疆異族女性一樣,具有危 險而致命的性誘惑。由於漢藏之間的大規模族群接觸甚晚,漢人 直至近代清末起才有規模地進入康區移墾,趙爾豐甚且鼓勵漢移 民落戶通婚。因此,正如任乃強在其著作中所致力再三者,欲同 化西番,移民通婚正是最好的手段,¹¹⁹從而達成真正的種族同 化。

四、藏人著作的雙重東方化

西方從古希臘時期起,即有關於西藏的傳聞。而到了近代,

劉曼卿所指稱的英、日人著作,大致說來有清末美國駐華外交人員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1854-1914, 一般通譯為柔克義)、英印官員 Sir Charles A. Bell (1870-1945)、日本僧人河口慧海(1866-1945)等。他們的解釋也大致是避免子女分家使家產分散,但同樣失之過簡。依 1970年代以後中外學界對藏人婚姻的研究,避免財產分散確實是一妻多夫制出現的原因,然而藏人並非無限制地任意實行多偶制婚姻,而是有其特殊的社會脈絡及價值觀支撐。不過,這個問題需要另文加以詳細解釋。關於藏人多夫制的研究,可參考: Melvyn C. Goldstein, "Stratification, Polyandry, and Family Structure in Central Tibet,"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27:1 (1971), pp. 64-74; Melvyn C. Goldstein, "Fraternal polyandry and fertility in a high Himalayan valley in northwest Nepal," Human Ecology, 4: 2 (June, 1976), pp. 223-233; Melvyn C. Goldstein, "Pahari and Tibetan polyandry revisited," Ethnology, 17: 1 (1978), pp. 325-337; Melvyn C. Goldstein, "When brothers share a wife: Among Tibetans, the Good Life Relegates many Women to Spinsterhood," Natural History, 96: 3 (March, 1987), pp. 39-48 等。

¹¹⁸ 任乃強,《西康圖經·民俗篇》,頁103。

¹¹⁹ 任乃強,《西康圖經·民俗篇》,頁219-222。

出於帝國的權力競逐、商貿利益、探險、傳教等等不一而足的理由,展開對西藏的各種冒險事業,終至 1904 年英軍以武力入侵西藏。¹²⁰另方面,西方對於西藏的認識,又有一部分是出於歐洲東方學的傳統而產生。為了配合英國在印度的殖民事業,東方學家在對印度宗教的研究過程中,開始對佛教展開研究,以西方哲學的概念來化約印度及佛教思想,從而在大學圖書館中創造出一個實體化的佛教。¹²¹在研究印度佛教的同時,歐洲東方學者也注意到西藏佛教對還原印度原始佛教的價值。這樣的東方學研究,其目的在於還原佛教史,找出其起源、發展與衰落。這意味著東方沒有能力進行自我陳述,東方遙遠的過去曾經有過、但已喪失的智慧,需要西方專業的東方學家來再現古代的東方文明。西藏佛教因此被判定為不是佛教的正統,是最為不肖的「喇嘛教」。¹²²

如同薩依德所揭示,西方對非西方的再現,乃是暗示著西方對權力與帝國冒險事業的欲望,在客觀與科學的研究背後,掩蓋著西方對東方的不平等關係。在對東方加以東方化的過程中,東方成為歐洲東方學者的專屬領域,通過「文化霸權」(hegemony)的影響力,將真實的東方化約成一個龐大的文本體系。¹²³Dibyesh Anand 則針對西方人對西藏的書寫方式提出批判。通過本質化與成見化的手法,形成了關於西藏最本質而片面的刻板印象。西藏

l²⁰ 關於西方對西藏的探險活動,見: John MacGregor, *Tibet: A Chronicle of Explora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0); Peter Hopkirk, *Trespassers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the Race for Lhas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米歇爾·泰勒 (Michael Taylor) 著,耿昇譯,《發現西藏》(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9)[譯自: Michael Taylor, *Le Tibet: De Marco Polo À Alexandra David-Néel* (Paris: Office du Livre, 1985)]。

Ill 關於歐洲的佛教研究中的東方主義傾向之批判,見: Frank J. Hoffman, "'Orientalism' in Boddhology: Western Pre-understanding in Understanding Buddhism," in Frank J. Hoffman and Deegalle Mahinda (eds.), Pāli Buddhism (London: Curzon Press, 1996), pp. 207-226.

¹²² 有關西方的西藏佛教研究中的東方主義之批判,見: Donald S. Lopez Jr., "Foreigner at the Lama's Feet," in Donald S. Lopez Jr., (ed.), *Curators of the Buddha: the study of Buddhism under Coloni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 251-296.

¹²³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的東方主義化,通過檔案化、凝視、分類、理想化、色情化及自 我肯定與自我批評等書寫策略來呈現。¹²⁴

雖然薩依德所提出的東方主義,其脈絡出現在歐洲帝國主義對東方他者的再現;不過,藉助於東方主義的概念,亦可以在比較研究中揭示非西方社會對於他者的再現,有相似的現象。Laura Hostetler 即以清代對西南苗族的民族志描繪為例,從比較歷史學的觀點,將《百苗圖》與同時代日本及鄂圖曼帝國的民族志文本進行對比,指出對他者的興趣並非西方獨有,而是近代早期國家建構過程的一部分。¹²⁵清帝國將非漢族群視為「異己」的態度,亦可見於西北的「回民」。Jonathan N. Lipman 對清代西北穆斯林社會的研究指出,西北穆斯林其實是帝國之內「熟悉的陌生人」(Familiar Stranger),由於法律與文化的偏見,為穆斯林塑造出暴力、凶猛的異己形象。¹²⁶而在當代中國,Louisa Schein 通過對苗族婦女的觀察,將非漢族群的文化展覽表演視為內部東方主義(internal orientalism)的結果;漢人將非漢族群構建為文化上的他者,暗示落後的非漢族群有待漢族的救助。¹²⁷

旅居中國內地的藏人,在接受現代化的意識型態與五族共和 的表述之同時,對西藏的歷史與文化有不同於漢人的看法;然而 從論述藏區的文本數量與漢藏之間現實政治力量的對比來說,漢 人無疑是主導的一方。對於表述西藏,中外一致都有東方主義的 傾向,同時又將少數藏人的自我表述加以東方化。

與任乃強同為康藏研究社一員的藏學家謝國安, 他發表在

Dibyesh Anand, Geopolitical Exotica: Tibet in Western Imagin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pp. 17-36.

Laura Hostetler, "Introduction: Early Modern Ethnography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David M. Deal& Laura Hostetler Trans., The Art Of Ethnography: A Chinese "Miao Albu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pp. xvii-lxvii.

Jonathan N. Lipman, 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Louisa Schein, "Gender and Internal Orientalism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 23: 1 (January, 1997), pp. 69-98。相近的觀點,亦可見:Dru C. Gladney, "Representing Nationality in China: Refiguring Majority/Minority Identit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3: 1 (February, 1994), pp. 92-123。

《康藏研究月刊》上的文章乃是由他口授、經任乃強筆記而成。 這樣文本形成的過程,代表藏人自己口授的地理表述,需要經過 更精確的界定。例如,雖然任乃強認為,能對岡底斯山詳述的國 人,「始於謝國安先生」; 128但是,有必要在藏人所指出的「岡底 斯山與其北方東西橫列的大雪山脈」這段文字之後,加上一段經 由西方人的科學命名來界定其真實性的文字:「(按,即斯文海定 所稱之外喜馬拉〔亞〕山脈)」。129而謝國安依據藏人所認知的傳 統藏區地理概念,指出整個藏區乃是:「藏人綜稱西康、安多與此 區〔引按,指青海〕曰多康(mdo-khams),與衛藏、阿里,同為 吐蕃之下中上三部。」¹³⁰對此,任乃強一方面批評中國舊時將藏 區給予康、衛、藏、阿里四部分劃法的不合理之處,乃是清人依 照蒙古固始汗征服之先後而命名;同時,他也認為,藏人相傳的 「上阿里三繞」、「衛藏四汝」、「下多康六岡」說法,是舊時代的 區劃,「全屬俱舍論方法之文藝作品,甚與科學方法背謬」; ¹³¹所 謂的「多康六岡」,只是如漢文中「五湖四海」這種文學成語。132 所以,有必要「依自然地理與歷史沿革,將藏人不科學的地域分 劃,加以整理」,而「國人以科學方法敘述西藏區域地理的,這算 第一篇文章〔引按,也就是指任乃強的文章〕」。 133亦即,藏人自 己對何謂西藏的表述,並不具「科學」意味,藏人的政治地理需 要漢人以科學的方法介入,重新定義。這其實又類似 Mary Louise Pratt 所指出的「反征服敘述」(anti-conquest narrative), 西方人於 非西方從事旅行探險的過程中,以「客觀中立」的「科學」來觀 察、分類、測繪殖民地,其背後的意涵即是以「科學的知識」取

¹²⁸ 任乃強,〈岡底斯與崐崙〉、《康藏研究月刊》、2(成都,1946.11)、《《康藏前鋒》《康藏研究月刊》《康導月刊》校勘影印全本》、第6冊,頁3187。

¹²⁹ 謝國安口述,任乃強筆記,〈岡底斯山紀異〉,《康藏研究月刊》,1(成都,1946.10),《《康藏前鋒》《康藏研究月刊》《康導月刊》校勘影印全本》,第5冊,頁3155。引按,斯文海定即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 1865-1952)。

¹³⁰ 謝國安,〈西藏四大聖湖〉,《康藏研究月刊》,2(成都,1946.11),頁3175。

¹³¹ 任乃強、〈西藏的自然區劃〉、《康藏研究月刊》、8(成都、1947.5)、頁3370。

¹³² 任乃強,〈多康的自然區劃〉,《康藏研究月刊》,9(成都,1947.6),頁3398。

¹³³ 編者,「目錄頁內容提要」,《康藏研究月刊》,8(成都,1947.5),頁3364。

代在地的知識,視之為落後與無價值的。134

除了以中文來介紹藏區與藏人之外,尚有少數藏人在西方人的協助下,以外語自我表述,面對世界。這些文本的形成,是由藏人口述、再經英人以英語寫出。而後,又因其獨特性的價值,再由中國人譯成中文。

倫琴拉木平日經由其英國領事丈夫 Louis King 告以「歐人書報所述西藏之狀況」,因而感到其中除少數瞭解同情外,「多數皆謬誤,令人憤怒」。所以她試圖告訴西方讀者「西藏之物質文化,與其民族之作用何狀,行動及思想之若何」。¹³⁵針對已經將西藏視為「絕塞之太古民族」的定見,倫琴拉木指出,「此類習慣語為一般旅行家風行一時」所致。那些英國作家關於西藏的著作,往往互相矛盾,「有謂吾族為奸猾,為機巧,有則謂之為呆木,為不仁,有謂藏人為無希望的懶漢,有則指為極勤生活者。有時一著作者本身所說,尚且自行鑿柄」。實際上,西藏地靈人傑,藏人心靈活潑,智識、身材、體力不下於西人,藏人並不將心力置於現代化的物質文明與競富畏貧,而是更重視人類心靈中合理生活的原則。「吾人不企圖現代以外之進步,不生活於時間表」;「吾人信仰吾宗教,企圖以天心護吾人之生命」。¹³⁶承載藏人宗教的喇嘛,多數皆精神高尚,絕非外人所言,品行腐敗,不可守潔,或謂僧侶為通向財富權力之捷徑。

對中譯本的讀者而言,由於國人對於藏事懵然無知,一切文 化地理的記載,亦如鳳毛麟角。因此欲探求蒙藏真相,非得取材 異地,¹³⁷從而譯者將此書譯為中文。然而即使是譯者本身,關注 的仍是帝國主義者英國人的角色。如同前述,倫琴拉木以「檀越 關係」來解釋清初時皇帝與藏人的特別關係,向世界說明西藏並 非從屬於中國,藏族乃是一共同體。準此,她評論趙爾豐於東藏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 38-39.

¹³⁵ 倫琴拉木著,汪今鸞譯,《西藏風俗志》,〈緒言〉,頁3、5。

¹³⁶ 倫琴拉木著,汪今鸞譯,《西藏風俗志》,頁71-74。

¹³⁷ 倫琴拉木著,汪今鸞譯,《西藏風俗志》,〈譯者序〉,頁1。

(川邊康區)推行的改土歸流:

西藏實為同種國,有種族之束縛,有歷史的傳統,有特殊的社會,有政治與物質文化的共同,故能團結一致,非雍正皇帝所得而分解之,亦非趙爾豐可能使其分崩離析。雍正之志願,不過欲使藏中各政事區域均與皇室直接生關係,而趙爾豐則擬統轄全藏,改藏為中國之一行省。¹³⁸

倫琴拉木的用意在於就歷史論證,要求中國承認西藏行政獨立之地位。特別的是,譯者汪今鸞認為:「原書此章多誣詆我國之語,本擬略為刪節,繼思不如仍全留以存其真,俾國人知英人陰險之用意。」¹³⁹由於英人的入侵與挑撥,從而導致中國失去對西藏的控制,但對於藏人提出的藏族共同體與藏中關係的特別解釋,卻有意忽略。

其實,自文本的產生起,正是語言的限制,而隱藏了不對等的論述能力。《西藏風俗志》這本書的形成過程,乃是由倫琴拉木口述,再由 Louis King 筆述,兩人之間語言的傳達,是以漢語作為中介,然後再由其夫 Louis King 譯為英文。140作為藏人,並不會以「喇嘛教」來稱呼藏人所信仰的佛教。但是,為了解釋藏人文化,特別是佛教,確實有賴於中國與印度,「而化為今日之喇嘛教」。141此處,或許不可能釐清「喇嘛教」(lamaism)一詞是倫琴拉木本意,還是 Louis King 的用詞。但這正顯示,即使藏人有意澄清,然而語言的表述限制了其真實意向。為了向世人證明,「西藏政治之入於世界地位」,在第五章中詳敘藏、英、中自1772年波格爾(George Bogle, 1746-1781)使藏以來的互動,其英國人的口吻簡直是榮赫鵬(Sir Francis Younghusband, 1863-1942)所著India and Tibet(此書最為熟知的中譯書名為《英國侵略西藏

¹³⁸ 倫琴拉木著,汪今鸞譯,《西藏風俗志》,頁53。

¹³⁹ 倫琴拉木著,汪今鸞譯,《西藏風俗志》,頁53-54。

¹⁴⁰ 倫琴拉木著,汪今鸞譯,《西藏風俗志》,〈緒言〉,頁4-5。

¹⁴¹ 倫琴拉木著,汪今鸞譯,《西藏風俗志》,頁6; Rin chen Iha mo, We Tibetans (London: Seeley service & Co. Itd., 1926), p. 14.

史》)一書的簡明翻版。女性藏人向世界發出的聲音,仍由白人男 性決定。

藏人的自我表述最終還必須從屬於其他語言,其類似的情 況,也出現在謝國安的身上。1924年 5-8 月間,經由他口述回憶、 再由打箭爐英國領事 G. A. Combe 執筆完成 A Tibetan on Tibet 此 一著作。¹⁴²在書中,Combe 以謝國安的教名 Paul Sherap (智慧 保羅)來稱呼他,是一位具有智慧、能說英語的藏人。在孤獨的 黑夜,由智慧保羅為作者講述藏人的故事,雙方乃是以問答方式 進行、紀錄, 143象徵著東方智慧必須由西方來引出。智慧保羅既 為一有道德的基督徒,又是一位尊敬喇嘛教的班智達;然而這位 擁有西方智慧的班智達,終究仍有程度上的限制,那就是他沒有 將西方的懷疑論貫徹到底,去相信某些喇嘛、僧尼具有神通;甚 至時間對藏人來說也沒什麼因果邏輯關係。144而在這本紀錄著智 慧保羅不凡經歷的書裡,為了讓西方讀者更加認識西藏佛教,理 應更由智慧保羅來發聲的第一章「佛教簡述」, Combe 基於有助 於在往後各章中解釋藏人思想單純的緣由,而由他來作一粗略的 簡介。¹⁴⁵Combe 的代言,卻援引當時以 T. W. Rhys Davids (1843-1922)、L. A. Waddell(1854-1938)為首的印度佛教專家之著作。 在這些英國的東方學者眼中,現代西藏的「喇嘛教」,即使已經過 宗喀巴的改革,但仍帶有西藏本土苯教鬼神崇拜的印記。但是, 正如 Donald S. Lopez 所指出,正是透過這些當時的印度佛教專家 有意識地使用喇嘛教一詞,而將西藏佛教貶抑為最低層次、原離 原始佛教教義的他者。146藏人謝國安此一具有普遍影響力的著 作,最終仍須從屬於東方學者所建構的西藏觀之下。

^{142 1942}年,人類學者李安宅(1900-1985)將此書六至八章(內容分別是結婚、死亡、葬法)摘譯,以〈藏人論藏〉篇名連載發表於《邊政公論》,1:7-8(四川巴縣,1942.3),頁95-102、1:9-10(四川巴縣,1942.5),頁67-77。

¹⁴³ G. A. Combe, A Tibetan on Tibet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26), Introduction, p. x.

¹⁴⁴ G. A. Combe, A Tibetan on Tibet, Introduction, pp. xiii, xi.

¹⁴⁵ G. A. Combe, A Tibetan on Tibet, p. 2.

Jr., Donald S. Lopez,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p. 32-42.

五、結論

民國時期漢人對於西藏佛教的態度,一直有著兩面性。一方面由於密宗熱潮的興起,西藏佛教被視為堪可救濟漢傳佛教正趨向沒落的良藥;¹⁴⁷但另一方面「喇嘛教」一詞所代表的,則是封建階級的剝削以及西藏落後的根源。當時,旅居中國內地的西藏人,僅通過各高級喇嘛在高等院校講學,以及通過法會等神秘主義的宗教儀式途徑來影響一般漢人大眾對西藏佛教的觀感。西藏拉薩當局更無暇去理會中國人如何認知、理解西藏及西藏佛教。就在 1959 年流亡印度之後,對西藏「封建農奴制度」以及西藏佛教,十四世達賴喇嘛對世人提出了他的辯護:

整體來說藏人不是一個會壓迫人的民族……因為……宗教……提供了源源不絕的慰藉與支援。

雖然算是封建制度,但與任何其他的封建制度不同,因為 位其頂端的是觀世音菩薩的轉世……在政府這些心胸狹窄 的官僚之上,還有一個他們可以絕對信任的正義之源可供 最後投訴……

對許多藏人來說,物質生活相當艱難,但他們並沒有被欲望所控制。在群山峻嶺中,簡單貧困的生活裡,我們可能 比世界上多數城市裡的人擁有更多平靜的心靈。¹⁴⁸

達賴喇嘛的此種辯護,其實某種程度上推動了1960年代以後西方人對西藏的看法,從而作為香格里拉神話的西藏掩蓋了真實西藏

¹⁴⁷ 有關民國時期西藏佛教在中國內地傳布的情形以及漢藏之間佛教的交流,見:梅靜軒,〈民國以來的漢藏佛教關係(1912-1949) — 以漢藏教理院為中心的探討〉,《中華佛學研究》,2(臺北,1998.3),頁251-288;劉婉俐,〈民國時期(1912-1937)漢傳佛教的現代化轉折:兼談藏傳佛教傳入民間的互涉與影響〉,《世界宗教學刊》,12(嘉義,2008.12),頁29-80;Gray Tuttle, 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¹⁴⁸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李江琳校,《我的土地,我的人民》 (臺北:臺灣圖博之友會,2010),頁66-67。

的政治需求。¹⁴⁹不過,對此時中國人來說,這種香格里拉神話並不存在。西藏一詞的意義,毋寧說,直接彰顯了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國家分裂危機。而藏方與川、康、青的幾次戰爭,則加重了此印象。

回顧民國時期藏人關於西藏的論述,即使是政治上最支持國民政府的班禪喇嘛與其他康區藏人,選擇排拒同化意識極強的「中華民族」訴求。相較之下,會更傾向於接受同化意識不那麼強烈的「五族共和」。對漢人來說,一切的漢藏關係史都需要放置在現代民族國家架構下來討論,然而藏人更願意將藏中關係視為宗教傳統下的「檀越關係」。民國時期漢藏之間最重要的爭執乃是康區(西康省)的歸屬。但不僅只有中國與西藏在認知上的差異,更為複雜的是,由於傳統上的康、藏之別,康區藏人形成了不同於西藏噶廈政府的主張。康人反藏的情緒,也表現在對達賴喇嘛建設「大西藏」的指責。進一步,康人在對抗達賴喇嘛與西康實際統治者劉文輝的過程裡,也援引了漢人的政治術語,打出「康人治康」口號。此種藏人自治的傾向,還表現在戰後關於國家邊疆治理的看法上。然而,藏人自治的訴求,終究未能為漢人所真正重視。

實際上,戰後面對國民政府試圖推行進一步行省化的措施,內蒙古部分王公已訴求內蒙古自治予以反制。¹⁵⁰然而國共內戰隨即展開,國民政府自然無法對族群政治的問題進行全盤性的思考與更動。1951年,當中共接手這個多民族統一國家下的西藏,其所採取的少數民族治理政策,乃是奠基於黨國一元體系與民族分類化之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¹⁵¹雖然在形式上,藏區的行政

¹⁴⁹ 嘉央諾布(Jamyang Norbu)即以藏人的立場,批評了海外流亡藏人的宣傳其實也是協助創造香格里拉神話的一環,見: Jamyang Norbu, "Opening of the Political Eye: Tibet's Long Search for Democracy," *Tibetan Review*, 25: 11 (November, 1990), pp. 14-19.

¹⁵⁰ 李玉偉,〈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與內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8:3 (總178期)(北京,2008.5),頁13-18。

¹⁵¹ 有關中共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形成與實施過程,見:吳啟訥,〈民族自治與中央集權——1950年代北京藉由行政區劃將民族區域自治導向國家整合的過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5(臺北:2009.9),頁81-137。

區劃接近清代的狀態,但其實際用意,乃是從地理上進一步分割 藏區,壓縮自治民族的地理空間與能量。訴求於以藏族作為政治 及地理單位的民族自治,無論如何,都須屈從於中國的民族國家 建構之下。

面對工業文明橫掃全球的趨勢,儘管旅居中國內地的藏人願意接受現代化的意識型態與五族共和的概念,但是藏人非常難以同意漢人將西藏文明貶抑為野蠻、非現代社會的觀點,並對漢人在種族、性別上的偏見及對西藏佛教的攻擊予以回應。就此而言,在認識西藏與再現西藏的過程中,藏人曾提供過不同於漢人所習知的西藏觀,然而藏人自己的聲音是微弱的。藏人的自我表述,在跨語言的翻譯過程中被稀釋、轉化,從而附屬於漢人與西方人關於西藏的論述。藏人的自我表述,在塑造漢人關於西藏的看法上,並未具有顯著的實際作用。或者說,藏人的自我西藏觀並未改變漢人對西藏的看法。152

¹⁵² 這個問題當然有待於對漢人西藏觀的進一步研究。此處僅暫以民國時期中小學生的讀本為例來說明漢人是如何再現與認知西藏。在一本專為學生考試之用而出版的名為《初中會考升學指導 第5集 中外史地問答》的題庫裡,藏族的民族性是「性厚重,對於宗教很迷信」;「喇嘛教」是「佛教之一種,與於西藏,專以祈禱禁咒為事」; 喇嘛教與一妻多夫制都是西藏人口稀疎的原因。見:章柳泉等編,《初中會考升學指導 第5集 中外史地問答》(南京:南京書店,1933),頁159、41。同樣,中小學生的教科書也充滿類似的偏見。而這些文字,其實又來自時人的各種西藏論述。

引用書目

一、史料彙編

- 《張蔭棠駐藏奏稿》,收入:吳豐培編輯,《清代藏事奏牘》,下冊,《西藏學漢文文獻匯刻》,第三輯,北京:中國藏學出版 計,1994。
-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九世班禪內地活動及返藏受阻檔案選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
-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1冊,臺北:中央文 物供應社,1984。
-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5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1,第2版。

二、辭典、工具書

- 丹珠昂奔主編,《藏族大辭典》,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 王堯、陳慶英主編,《西藏歷史文化辭典》,杭州:西藏人民出版 社、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 劉紹唐主編,《民國大事日誌》,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9.5。
- 三、期刊史料、報紙
- 川康邊防軍總指揮部,《邊政》月刊。(1929年9月創刊,原為月刊,後為不定期刊,至1931年第9期停刊。)
- 西陲宣化使公署宣傳處編,《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收入:馬大正主編,《民國文獻資料叢編,民國邊政史料匯編》,第 6-7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 西藏班禪駐京辦公處宣傳科編,《西藏班禪駐京辦公處月刊》,收入:徐麗華、李德龍主編,《中國少數民族舊期刊集成》,第 24-25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海潮音月刊編輯委員會編,《海潮音》,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

- 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147-204 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 縮微複製中心,2006。
- 康藏前鋒社編輯部編,《康藏前鋒》,收入:徐麗華、李德龍主編,《中國少數民族舊期刊集成》,第 32-35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
- 康藏研究月刊編,《康藏研究月刊》,收入:姚樂野主編,《《康藏前鋒》《康藏研究月刊》《康導月刊》校勘影印全本》,6-7 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1。
- 新亞細亞月刊社編輯部編,《新亞細亞》,收入:徐麗華、李德龍 主編,《中國少數民族舊期刊集成》,第56-70冊,北京:中華 書局,2006。
- 蒙藏委員會編譯室編,《蒙藏旬刊》,收入:徐麗華、李德龍主編,《中國少數民族舊期刊集成》,第 27、29-32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
- 蒙藏委員會總務處編,《蒙藏委員會公報》,收入:馬大正主編,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民國邊政史料匯編》,第8-14 冊,北 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 鎔青,〈西藏女子實行多夫制之原因 注重宗族血統 保留遺產制度〉,《世界日報》(北平),1928年11月4日,第8版「世界要聞」。

四、專書

- 清·不著撰人,《衛藏通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第六八三冊,據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袁昶輯刊《漸西村舍叢刊》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清·黃沛翹,《西藏圖考》,清光緒 20年(1894)京都申榮堂校刊本。
- 《西藏民主改革 50 年》白皮書,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9。
- 丹珠昂奔主編,《歷輩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年譜》,北京:中

- 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
- 牙含章,《班禪額爾德尼傳》,北京:華文出版社,2000。
- 王柯,《20世紀中国の国家建設と「民族」》,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6。
- 任乃強,《西康圖經‧民俗篇》,南京:新亞細亞學會,1934。
- 米歇爾·泰勒 (Michael Taylor) 著,耿昇譯,《發現西藏》,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9。(譯自:Taylor, Michael. *Le Tibet: De Marco Polo À Alexandra David-Néel*. Paris: Office du Livre, 1985)
- 吳豐培、曾國慶,《清代駐藏大臣傳略》,拉薩:西藏人民出版 計,1988。
- 呂思勉,《初中標準教本 本國史》,全四冊,上海:中學生書局, 1935年6月初版;收入:呂思勉,《呂著中小學教科書五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臺北縣新店市:四川文獻月刊社, 1971。
- 林冠群,《唐代吐蕃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 倫琴拉木 (Rin chen lha mo, Mrs Louis King) 著,汪今鸞譯, 《西藏風俗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Rinchen lhamo (Mrs. Louis King), King, Louis Magrath. We Tibetans. London: Seeley service & Co. ltd., 1926.]
- 根敦瓊培(Dgevdunchosvphel)著,法尊譯,王沂暖校訂,《白史》,蘭州:西北民族學院,1981。
- 格桑澤仁,《康藏概況報告》,1932年,收入:《民國史料叢刊》, 第867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 格桑澤仁,《邊人芻言》,重慶:西藏文化促進會,1946年11月, 鉛印本,收入:張羽新、張雙志編纂,《民國藏事史料彙編》,第19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 格勒,《論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與周圍民族的關係》,廣州:中山 大學,1988。

- 茨仁夏加著,謝惟敏譯,《龍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後的西藏》,新 北市:左岸文化,2011。[英文本: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李江琳校,《我的土地,我的人民》,臺北:台灣圖博之友會,2010。
- 郭卿友編著,《民國藏事通鑒》,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
- 陳慶英、高淑芬主編,《西藏通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
- 陳慶英、馮智,《藏族地區行政區劃簡說》,北京:五洲出版社, 1995。
- 章柳泉等編,《初中會考升學指導 第5集 中外史地問答》,南京:南京書店,1933。
- 智觀巴·貢卻乎丹巴繞吉著,吳均、毛繼祖、馬世林譯,《安多政教史》,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89。
- 馮有志,《西康史拾遺》,康定:中國人民政協會議甘孜藏族自治 州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94。
- 圓覺宗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教育基金會編輯組整理,《諾那呼圖克圖 法語開示錄》,臺北:圓覺宗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教育基金會, 2002。
- 熊禹治,《解決康藏問題建議書》,出版者、出版地不詳,1931。
- 劉家駒編譯,《班禪大師全集》,重慶:班禪堪布會議廳,1943。
- 劉家駒,《西藏政教史略》,出版地不詳:中國邊疆學會,1948。
- 劉家駒、《康藏》、上海:新亞細亞月刊社、1932。
- 劉曼卿,《康藏軺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鉛印本,收入:吳海鷹主編,《回族典藏全書》,第235冊,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
- 劉曼卿,《邊疆教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 蘇發祥主編,《歷輩班禪額爾德尼》,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石濱裕美子,《清朝とチベット仏教:菩薩王となった乾隆帝》, 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2011。
- 松本ますみ、《中國民族政策の研究――清末から 1945 年までの 「民族論」を中心に》、東京: 多賀出版, 1999。
- Anand, Dibyesh. *Geopolitical Exotica: Tibet in Western Imagin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 Bell, Sir Charles A. *Tibet: Past and Pres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8.
- Bishop, Peter. Dreams of Power: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London: Athlone Press; Rutherford, N.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Bishop, Peter. The Myth of Shangri-La: Tibet, Travel Writing, and the Western Creation of a Sacred Landscap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Combe, G. A. A Tibetan on Tibet.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26.
- Dodin, Thierry& Heinz Rather, eds., *Imagining Tibet: Perceptions*, *Projections*, and Fantasies.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1.
- 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Goldstein, Melvyn C., Dawei Sherap, and William R. Siebenschuh,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üntso Wangye*.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Hopkirk, Peter. Trespassers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the Race for Lhas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Jagou, Fabienne, translated by Rebecca Bissett Buechel, The Ninth

- Panchen Lama (1883-1937): A Life at the Crossroads of Sino-Tibetan Relations.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Chiang Mai, Thailand: Silkworm Books, 2011.
- Lin, Hsiao-Ting.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 Vancouver: UBC Press, 2006.
- Lipman, Jonathan N. 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 Lopez, Jr., Donald S.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 MacGregor, John. *Tibet: A Chronicle of Explora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0.
- Neuhaus, Tom. *Tibet in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 Nietupski, Paul Kocot. Labrang: A Tibetan Buddhist Monastery at the Crossroads of Four Civilizations. New York: Snow Lion Publications, 1999.
- Petch, Luciano.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Tibet. Leiden: E. J. Brill, 1950.
- Powers, John. History as Propaganda: Tibetan Exiles versu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Pratt, Mary Louise.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Richardson, Huge E. *Tibet and Its History*. Boston: Shambhala, 1984, 2nd.
- Rinchen Ihamo (Mrs. Louis King), King, Louis Magrath, We Tibetans. London: Seeley service & Co. ltd., 1926.
-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 Schell, Orville. Virtual Tibet, Searching for Shangri-La from the

- Himalayas to Hollywood. Henry Holt& Company, Inc, 2000.
- Shakabpa, Tsepon W. D.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 Stein, Rolf A. trans. by J. E. Stapleton Driver, *The Tibetan Civilization*. London: Faber, 1972.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La civilisation tib étaine*. Paris: Dunod Éditeur, 1962)
- Thubten Jigme Norbu and Turnbull, Colin M., *Tibe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8.
- Tuttle, Gray. *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五、論文

- 王川,〈諾那活佛在內地的活動及對康藏關係的影響〉,《中國藏學》,2008:3(北京,2008),頁121-127。
- 王川,〈格桑澤仁傳略〉,《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 211(成都,2009.3),頁28-32。
- 任新建,〈康藏研究社介紹〉,《中國藏學》,1996:3(北京,1996),頁21-29。
- 江安西、來作中、鄧俊康,〈諾那事變記略〉,中國人民政協會議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四川省省志編輯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 29 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頁64-77。
- 吳啟訥,〈民族自治與中央集權——1950年代北京藉由行政區劃將 民族區域自治導向國家整合的過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集刊》,65(臺北,2009.9),頁81-137。
- 李玉偉,〈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與內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中央 民族大學學報》,2008:3(總 178 期)(北京,2008.5),頁 13-18。
- 李明忠,〈劉家駒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員會編,《甘孜州文史資料》,第11輯,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90,頁73-79。

- 村田雄二郎、〈孫中山與辛亥革命時期的"五族共和"論〉、《廣東社會科學》、2004:5(廣州、2004)、頁121-128。
- 沈衛榮,〈"懷柔遠夷"話語中的明代漢、藏政治與文化關係〉,《國際漢學》,第13輯(鄭州,2005.9),頁213-240。
- 沈衛榮,〈神通、妖術和賊髡:論元代文人筆下的番僧形象〉,《漢學研究》,21:2(臺北,2003.12),頁219-247。
- 協饒益西,〈近代康區著名政治活動家——格桑澤仁〉,《康定民族 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4:6(康定,2005.12),頁8-11。
- 卓鴻澤、("吐蕃"源出"秃(偷)髮"問題析要〉、《歷史語文學論叢 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70-97。
- 周錫銀、〈諾那的部分重要史料輯錄〉,中國人民政協會議四川省 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四川省省志編輯委員會編、《四 川文史資料選輯》,第 29 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頁88-94。
- 林孝庭,〈戰爭、權力與邊疆政治:對 1930年代青、康、藏戰事之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5(臺北,2004.9),頁105-141。
- 林冠群,〈「大西藏」(Greater Tibet)之商権——西藏境域變遷的 探討〉,《蒙藏季刊》,20:3(臺北,2011.9),頁30-47。
- 林冠群,〈試論孫文「五族共和」思想〉,《中國邊政》,169(臺 北,2007.3),頁1-17。
- 柳陞祺、常鳳玄,〈西藏名義辨析〉,《中國藏學》,1988:2(北京,1988),頁21-31。
- 張雲,〈"大西藏"與"西藏獨立"的夢想〉,《西藏歷史問題研究》, 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頁167-169。
- 張雲,〈再論西藏行政區劃與"大西藏"問題〉,《西藏歷史問題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頁180-191。
- 張踐,〈班禪返藏與"甘孜事變"〉,《青海民族研究》, 18:4(西寧 2007.10), 頁 117-121。
- 梅靜軒,〈民國以來的漢藏佛教關係(1912-1949) 以漢藏教

- 理院為中心的探討〉、《中華佛學研究》、2(臺北,1998.3)、 頁251-288。
- 陳強立,〈格桑澤仁、諾那、劉家駒〉,中國人民政協會議四川省 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四川省省志編輯委員會編,《四 川文史資料選輯》,第 27 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頁117-129。
- 陳慶英,〈漢文「西藏」一詞的來歷簡說〉,《燕京學報》, 1999:6 (北京,1999.5),頁129-140。
- 陳濟博、〈我所知道的諾那〉,中國人民政協會議四川省委員會文 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四川省省志編輯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 料選輯》,第29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頁77-87。
- 喜饒尼瑪,〈九世班禪出走內地述略〉,喜饒尼瑪,《近代藏事研究》,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頁 163-179。
- 黄天華,〈民國西康格桑澤仁事件研究〉,《四川師範大學學報》, 36:5(成都,2009.9),頁117-123。
- 黃英傑,〈上師生命的聖與俗——諾那活佛轉世身分初探〉,《輔仁宗教研究》,19(臺北,2009.9),頁167-200。
- 黄英傑,〈民國佛教懸案——諾那活佛死亡之謎初探〉,《輔仁宗教研究》,21(臺北,2010.9),頁181-203。
- 楊質夫,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上)〉,《中國藏學》, 2008:3(北京,2008.7),頁207-217。
- 劉婉俐,〈民國時期(1912-1937)漢傳佛教的現代化轉折:兼談藏傳佛教傳入民間的互涉與影響〉,《世界宗教學刊》,12(嘉義,2008.12),頁29-80。
- 劉曉原,〈從「五族共和」到五域統合——辛亥革命與中國國家形態近代轉型〉,「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會議論文,臺北:國史館,2012。
- Gladney, Dru C. "Representing Nationality in China: Refiguring Majority/Minority Identit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3:

- 1(February, 1994), pp. 92-123.
- Goldstein, Melvyn C. "Fraternal polyandry and fertility in a high Himalayan valley in northwest Nepal." *Human Ecology*, 4: 2 (June, 1976), pp. 223-233.
- Goldstein, Melvyn C., "Pahari and Tibetan polyandry revisited" *Ethnology*, 17: 1 (1978), pp. 325-337.
- Goldstein, Melvyn C. "Stratification, Polyandry, and Family Structure in Central Tibet."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27: 1 (1971), pp. 64-74.
- Goldstein, Melvyn C. "When brothers share a wife: Among Tibetans, the Good Life Relegates many Women to Spinsterhood." *Natural History*, 96: 3 (March, 1987), pp. 39-48.
- Hoffman, Frank J. "'Orientalism' in Boddhology: Western Preunderstanding in Understanding Buddhism." In Hoffman, Frank J., & Mahinda, Deegalle, eds., *Pāli Buddhism*. London: Curzon Press, 1996, pp. 207-226.
- Hostetler, Laura. "Introduction: Early Modern Ethnography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Deal, David M. & Hostetler, Laura Trans., *The Art Of Ethnography: A Chinese* "Miao Albu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pp. xvii-lxvii.
- Jamyang Norbu. "Opening of the Political Eye: Tibet's Long Search for Democracy." *Tibetan Review*, 25: 11(November, 1990) pp. 14-19.
- Lopez, Donald S. Jr. "Foreigner at the Lama's Feet." In Lopez, Donald S. Jr., ed., *Curators of the Buddha: the study of Buddhism under Coloni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 251-296.
- Peng, Wenbin. "Frontier Process, Provincial Politics and Movements for Khampa Autonomy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 Lawrence Epstein (ed.), Khams pa Histories: Visions of people, Place and Authority. Leiden, Netherlands; Boston Mass.: Brill, 2002.
- Ruegg, D. Seyfort. "MCHOD YON, YON MCHOD AND MCHOD GNAS / YON GNAS: On the Historiography and Semantics of a Tibetan Religio-Social and Religio-Political Concept." In McKay, Alex, (ed.), *The history of Tibet*.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Vol. 2, pp. 362-372.
- Schein, Louisa. "Gender and Internal Orientalism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 23: 1, (January, 1997), pp. 69-98.
- Shen, Weirong & Wang, Liping, "Background Books and a Book's Background: Images of Tibet and Tibetan Buddhism in Chinese Literature." In Esposito, Monica (ed.), *Images of Tibe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ème-Orient, 2008, Vol. I, pp. 57-84.
- Slobodnik, Martin. "The Perception of Tibet in China: Between Disdain and Fascination",《輔仁歷史學報》,17(臺北,2006.11),頁71-109。
- Waley-Cohen, Joanna. "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Issue 88 (Winter, 2004), pp. 193-206.
- Zhao, Gang. "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odern China*, Vol. 32: 1(January, 2006), pp. 3-30.

六、網路資源

"Memorandum on Geniune Autonomy for the Tibetan people",「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網」,網址:http://tibet.net/important-issues/sino-tibetan-dialogue/memorandum-on-geniune-autonomy-for-the-tibetan-people/

Tibetans on Tibet: Tibetan perception of Tibet in the Republican Era

Jian, Jin-sheng*

Abstrac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numerous studies on the Western perception of Tibet in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there are fewer studies to explore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Tibet. In the Republican Era a great deal of writings about ethnic minorities and borderland, including Tibet, were published. Authors of these works on Tibet issues are not only Han Chinese, but also those Tibetans who at that time lived in China proper. This paper examines what perception of Tibet were presented to Chinese by analysing the contents of periodicals founded by the ninth Panchen Lama and the writings of Tibetans.

Due to the resistance to Dalai Lama and Tibetan government, Panchen and Khampas claimed the Khams [Xikang] does not belong to Tibet in Xikang-Tibetan border conflicts, which is the only thing that Tibetans living in China proper agreed with Chinese. On the other side, to stand against the Xikang warlord Liu Wenhui, Khampas referred to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insisted by Chinese and declared the slogan of Khampa Autonomy [Khams ruled by Khampas]. Chinese appealed to Tibetans' support of "the Chinese people" [zhonghuaminzu] and claimed to sovereignty over Tibet. In response Tibetans brought forward the "Republic of the Five Races" [Wuzugonghe] and priest and patron relationship. In spite of having been received the ideology of modernization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Sanminzhuyi], Tibetans did not agree with Chinese critique of their being uncivil and reacted against the racial and religious prejudice from Chinese. However, the voices of Tibetans

^{*}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emselves were faint though Tibetans living in China proper have provided different views of Tibet to Chinese. Tibetans' own expression about Tibe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were diluted in translation, and were subordinated to the Tibet in Chinese and Western imagination.

Key words: Tibet, The Perception of Tibet, Sino-Tibet relations, Ninth Panchen, Khampa Autonomy